

人生借鉴丛书

*Dreißiger*

# 三十而立 名人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时代》周刊著名专栏作家真诚奉献！

中华书局

Dreißi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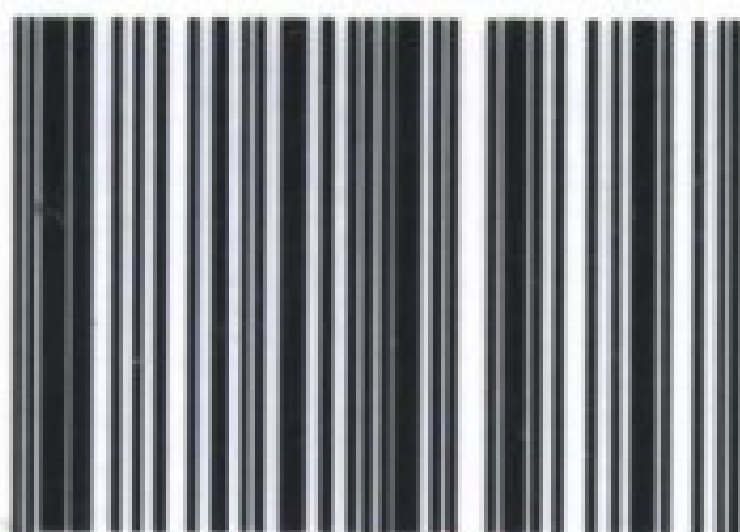
## 三十而立

三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离死神多远？为什么歌德出走意大利？为什么弗洛伊德爱上了可卡因？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龄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已经被别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

著名的《时代》周刊《谈天说地》专栏主笔格哈德·普劳泽对这一类问题作了探讨，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

ISBN 7-101-03975-8



9 787101 039757 >

定价：15.00 元

# 《人生借鉴译丛》

孔德明 印芝虹 主编

## 三十而立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徐 莉 译

孔德明 校

中 华 书 局

**Dreissiger.Ein Geschenk für alle zwischen 30 und 40 by  
Gerhard Prause**

**Copyright © 1983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京图字:01-2002-332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而立/(德)普劳泽著;徐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人生借鉴译丛/孔德明,印芝虹主编)

ISBN 7-101-03975-8

I.三… II.①普…②徐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821 号

---

**书 名** 三十而立

**丛 书 名** 人生借鉴译丛

**著 者** [德] 格哈德·普劳泽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译 者** 徐 莉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7<sup>1</sup>/<sub>2</sub> 字数 88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975-8/I·506

**定 价** 15.00 元

---

## 前 言

小的时候,人们渴望自己尽快成长,以便早日长大成人。但长大后,即便才二十多岁,大部分人就想推迟年龄增长以及后来成为老人的过程。没有人愿意在二十六岁时就被算作三十岁的人,即使到了二十九岁也还是不愿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却愿意说自己仍属而立之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年龄段,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同样如此。

可见数字会对人产生一种很大的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尤其是生命年轮中的整岁数,它们让人感觉是一个跳跃,一个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人以欣慰,庆幸自己毕竟达到了这个年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逢十的整生日给人们提供了契机,去感激和总结,去回顾过去十年,也去展望未来十年,去祝福自己以及享受别人的祝福。庆祝生日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习俗。

“人生借鉴译丛”向大家讲述古往今来著名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在某个年龄段的种种境况遭遇:他们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如何?经历过什么?有何规划以及有何行动?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是否幸福?对未来还有着信仰,还是早已灰心断念?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做到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为此我引用了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自传里的一些文字。因为他们自己的表述最能说明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担忧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而高兴。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岁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已经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包括衰老这惟一能够延长生命的现象。同

时，以整个生命长河为背景来观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即使伟人、名人和成功人士也会一次次陷入茫然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然而，读者看见，生活又继续前行了，并且往往就在这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福迎面走来。

格哈德·普劳泽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

**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Fjodor M. Dostojewskij**

**1821—1881**

“我期待着，五分钟后  
让子弹穿过我的胸膛。”



# 断头台与作家

##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

妥耶夫斯基：俄罗斯作家，代表作

有《罪与罚》、《白痴》、《群魔》、《穷

人》、《死屋手记》、《卡拉马佐夫兄

弟》等。

1851年10月30日，这天是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岁的生日。此时的他已经做了将近四年的囚徒。作为一名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刑事犯，整整四年，他都得带着那副重达10公斤的脚镣，和许多重罪犯挤在狭窄的牢房中，没有片刻独处的机会。关于那间牢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获释后不久向长他一岁的哥哥米哈依尔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所年久失修的旧木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根本不能住人，像这样的房子其实早就该拆掉了。夏天是难以忍受的炎热，冬天又是难以忍受的寒冷。地板腐烂不堪，上面堆积了一英寸厚的污

物。房顶漏水,屋子里到处灌风。我们像沙丁鱼一样被装在一个桶中——前室安置了一个用于大小便的木槽,臭气熏天。囚徒们个个像猪一般散发着臭味儿……跳蚤、虱子,还有其它各种数不清的虫子。”

三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时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由大学生、公务员、教师、军官和小市民组成的小组,其罪名是企图颠覆现有国家秩序。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的罪名则是曾在该小组当众念过一封“针对教会和国家,措辞狂妄激烈”的信函,并以此种方式“参与传播有关宗教的有害思想”,“激发对当局的仇恨”。

在拘留待审期间,这名二十七岁的年青人写下了一篇详尽的辩护词。其中,他写道:“我被控诉发表了有关政治、西方社会以及审查制度的言论。然而,谁又不在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我没有权利表达个人观点以及对所谓的权威观点提出相反的意见,那我何以要求学,何以要在学习过程中激发自己的求知欲?……是你们给我

们灌输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唤起了我们心中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可是，如今你们要来控告我们。我们饶有兴致地谈论一下西方社会，发表一点有关时政的看法，阅读几本热门书，你们就为此要来控告我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做？……”

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捕了。八个月后，在12月的一个早晨，他们突然被带出牢房，听取审判结果。他们不知道，政府究竟对他们做了怎样的判决。

很多人相信自己会被无罪释放，因为在小组的几次聚会中，他们只是参与讨论了一番。

牢房外，用来押解他们的囚车已经准备完毕。车窗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天也还是漆黑一片，他们看不到囚车行驶的方向。车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停了下来。犯人们下车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断头台前。他们被带到断头台上，听人宣读了判决。每个名字后面都是同样的一句话“判处死刑，枪决执行！”一共20遍。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我们不可能被处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身边的狱友说道。

到场的一名神甫要求死刑犯们进行忏悔。只有一个人照办了，但是所有的人都吻了递上前来的十字架。然后，前十名犯人绑上了柱子。每个柱子前都站了一名枪决执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绑在第六根柱子上。多年后，他这样向人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所有的希望就在那一瞬间全部破灭。我期待着，五分钟后让子弹穿过我的胸膛。……我们被人脱掉衣服，塞进一件又宽又大的殓衣中，然后，就这样在零下 22 度的严寒中熬过了 20 分钟。……我不记得我当时感到过一丝的寒冷……”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身边的狱友们道别时，突然有士兵走向已经绑上柱子的死刑犯，替他们松了绑。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到了未缚的囚犯们中间。一名军官当众宣读了一份声明：所有的人都免去死刑，改判监禁。几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的性命是皇帝陛下赐予的。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判决。……我被判处四年苦役……。”平安夜那

天是苦役犯们出发去西伯利亚的日子，在信纸页边的空白处他又写道：“我不知道，到时是否得步行还是可以骑马。但愿能骑马去。也许！”

有关死刑判决的真相到后来才被证实是一场恶作剧。所谓的死刑判决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有人想吓唬一下那些被判刑的人，想以此来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是多么的渺小。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断头台上的这20分钟却成了他日后写作生涯的核心。他经常回忆起那段往事：

“谁说人的本性能够承受这样的事实而不至于发疯？如此一番侮辱，目的何在？……一个已经听到过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的人，一个为此而承受了巨大痛苦的人……他或许有话要说！这般经历就连耶稣基督也会认为是种苦痛和恐惧。不，不能这样对待人！”

当他在那座日后被他称为“死屋”的监狱度过艰苦的四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兄长的信中这样描述那些一同服刑的非政治犯们：“他们是一群被激怒了的、心怀不满的野蛮人。对于

贵族，他们有着无尽的仇恨。他们用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敌意和目光来打量我们。要是办得到，他们会把我们整个吞下去。如今，判决本身成了我们与这些人在一起时所时刻面临的危险，和他们一起吃、一起睡。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向别人申诉我们一直在遭受的不平……150个仇敌，不厌其烦地折磨我们，并以此为乐，以此来打发时间……我们手中惟一的盾牌就是我们的冷漠以及他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尊重的道德优势。”

四年苦役过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西伯利亚服了四年兵役。然而，这段恐怖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更脆弱，尽管此后纠缠了他一生的癫痫病此时开始频繁地发作。牢狱生活从精神上锻炼了他，他由此而变得更加坚强。三十二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愿告诉你，在这四年中我的灵魂、我的信仰、我的精神以及我的心灵经历过哪些变化。一切说来话长……如今，我有了一些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需要和希望……”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沙皇的批准并回到圣彼得堡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继《死屋手记》(1861/1862年)之后,他又进行了22年的创作,写下了一系列伟大的小说,这其中有《罪与罚》(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1872年),《少年》(1875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年)。



约翰·沃尔夫冈·

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即使身处最不起眼的  
小乡村和荒无人烟的孤岛，  
我也会同样勤奋卖力……”



# 死亡之跳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德国作家，公认的世界文学巨人之一。

1779年8月28日，约翰·沃尔夫冈·歌德——他的贵族封号“冯”是在三年后才得到的——在他三十岁生日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生日自由快乐。”五天后：“自从三十岁生日那天起，周围的事物奇迹般地焕然一新；但愿这一刻永远留驻。我的内心为一种酣畅的快乐所占据，我的幽默没有沾染上丝毫的卑微，就连天气也是分外晴朗。”

四年前，因《葛兹》和《维特》而名声大噪的歌德应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来到魏玛，之后便一直生活在此。多年以后，在与艾克曼的一次谈话中，歌德这样描述这位比他小了八岁的公爵：“我们不久便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无论我做什么，他总是如影随形地相伴左右……我们

整晚整晚地促膝深谈有关艺术与自然的话题以及其他一切所能想到的美好事物。我们经常坐到深夜，也常常在沙发上相伴而眠……他像一瓶名贵的葡萄酒，但仍处在剧烈的发酵阶段。他不知道该如何释放他的激情，为此，我们常常徜徉在生命的边缘，与死神对决。我们连续数日策马疾驰，越过一个个灌木丛，飞过一座座陵墓，穿过一道道河流，在连续不断的上山下坡中耗尽自己的精力。晚上，我们燃起一丛篝火，在林中野营。一切均是按他的心意所为……”

年轻公爵的这种狂飙突进式的狂野生活也十分符合歌德的口味，公爵并不介意他们在这不足六千人口的魏玛以及有关两人不羁行为的消息传入到其他各州所引起的议论。比歌德小了两岁的约翰·海因里希·福斯其时正准备译介荷马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在哥廷根耳闻了两人的轻浮举止后也吃惊不小。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这样说道：“魏玛正上演着一出恐怖之剧。公爵带着歌德像野兽一样在村庄间乱窜，他狂饮无度，还和歌德兄弟般地共享一个女孩。

一位冒险劝戒他保重身体、停止这种不羁行为的大臣得到的回答是——为了增强体质，他不得不这样做。”

他的传记作家里夏尔德·弗里登塔尔这样描述歌德初到魏玛时的情形：“穿着一身维特式服装，但不久便换上了佩有黄玫瑰的蓝色燕尾服，脚蹬半长靴，以显示他的健壮身材。他开始用具有‘葛兹风格’的语言说话，要是餐桌上的汤太烫，即便置身宫廷，他也会毫无顾忌地用‘活见鬼’、‘该死’、‘见鬼’等粗鲁的词语大声咒骂。骂声惊动了公爵夫人路易丝，但她对此却毫无办法。只有她还坚持遵循古老而神圣的餐桌秩序，那也就是，只有贵族才可以与公爵同坐一席，非贵族则必须在小餐桌——即所谓的马夫桌——用膳。而当时已成为枢密参事的歌德，虽然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公爵的宠儿，在他得到皇上赐予的贵族封号之前却一直不能与公爵同桌共席。而且正由于他在礼仪方面的种种问题，这个贵族封号着实令公爵费了一番脑筋。”

在此之前，无论是在其出生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求学地莱比锡、斯特拉斯堡，还是在其作为韦茨拉尔候补官员期间，歌德过的都是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不管他有多么地热爱与公爵在一起的这种自由不羁的生活，但这绝对不是让他安心留在魏玛的惟一原因。他之所以愿意留在那个乡土气息甚浓的公爵领地，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在那儿可以作为统治者参与执政。他要的不仅仅是影响力，也不想只饰演某一位文化大臣的角色，不，他的打算是对魏玛公国，这个小国家的财政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改善政治、经济和人际关系，使之变得更加透明。很长一段时间后，歌德才开始关心文化事务。在他初到魏玛的前几年中，他根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然而，看似不尽心却坚持不懈地干一件事，却是他一贯的工作风格。

三十岁生日过后没多久，歌德即被任命为枢密参事；在此之前他曾做了四年之久的公使馆参赞，每年的俸禄(1200 塔勒)是当时全德国

的第二高薪。歌德上任后的第一项计划就是重新开发图林根森林里一个曾被开采过的铜矿，为此他在魏玛，更准确地说是在伊尔默瑙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热情。该铜矿是他在图林根近郊巡游时偶然发现的，从前也出产过银矿石。根据当地人的描述，这个被废弃的矿中还有着数不清的宝藏。歌德是否曾梦想通过在此找到大笔财富来一举解决小公国的财政危机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歌德在这个计划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不辞辛劳地参与每一项与开发矿藏有关的细节工作。仅仅就勘探权一事就得与一切有关人员和有关部门进行谈判磋商，之后还得征召相关的专业工作者。此外，资金短缺也是一个难题，他们必须筹措到足够的开发资金。1784年2月，此时已三十四岁的歌德终于完成所有的前期工作，正式开始了矿山的挖掘工作。然而，由于矿井渗水，整个工程最后毁于一旦，所有人力物力投入均以失败告终。

在这之前，歌德还接手过很多重大任务。他曾负责火灾预防条例的起草及实施工作（因为

当地的村庄经常发生严重的火灾)。他曾担任筑路大臣，主持了公国全部道路的扩建及保养工作(为此，在歌德的推荐下被公爵邀请到魏玛担任教区牧师负责教会和学校事务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曾揶揄地称他为“首席道路清洁工”)。除此之外，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公国军队的新兵招募和武器装备事务也是歌德工作的一部分。当然，“军事委员会”、“军队”和“新兵招募”这些称谓相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来说，显得过于夸张了。事实上，魏玛的军事力量是由一支 532 人的步兵、一个 8 名士兵加 1 名军官的炮兵部队和 30 名轻骑兵组成的。歌德缩减了这支小型军队的规模，也就是说，他以整顿为由进行了一番裁军——步兵由原来的 532 人精简到 293 人，炮兵则被撤消了。30 名轻骑兵最终全部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可以作为马背上的信使为歌德和公国亦公亦私（公者，与公爵等；私者，与夏洛特·冯·施泰因等）繁忙的书信往来服务。

身负数职对而立之年的歌德而言绝非容

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名外乡人在那些本地同僚中遭遇了无数的冷漠、怀疑和拒绝。公爵越是支持他,他就越是难以摆脱“宠儿”之名。很明显,他曾致力于改善这种不协调;为此,他整日忙于他的管理工作,以此来忘却他人的忌妒。

他曾这样写道:“工作上的压力是一种非常美妙的精神体验。精神一旦爆发,定将获得更大的自由去享受人生。生活舒适但没有工作的人是不幸的,他体味不到才华横溢给人带来的巨大快乐。”三十二岁时,他在信中对卡尔·路德维希·冯·克内贝尔说道:“我的天性促使我有男子汉般的举动。为了生存,即使身处最不起眼的小乡村和荒无人烟的孤岛,我也会同样勤奋卖力……因为凭借坚强与忠诚获得在当时的境况中独自攀登高峰的能力是我的一个信条,我的付出是暂时的,得到的却是永恒的。”

这种在自我完善方面一步步趋向完美境界的设想背后,除了有对“男子汉般举动”的需求,还存在着其他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比歌德年长了七岁的夏洛特·冯·施泰因。夏洛特是公

爵马厩长约西亚斯·冯·施泰因的妻子，在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中生了七个孩子。第一次与歌德相遇时，她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精神友谊；而对于这种精神友谊，歌德只能做出如下解释：“这个女人对我的一种控制力，我只能用灵魂转世一说来解释。是的，前世的我们曾是一对夫妻！现在，我们必须隐藏在一层精神薄雾之下。”

他称这个不仅向他传授了各种宫廷礼仪和举止，还教他学会了很多其他东西的女人为“慰藉者、天使、圣母玛丽亚”。在她的影响下，他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他开始追求一种宁静、温和、单纯而井然有序的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他完成了后来被他称为“极具人性”的剧作《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的第一稿。

渐渐地，歌德感觉自己受到了这种有条不紊的生活状态和日益繁忙的公务的束缚。这个年近三十三岁的男人似乎迷失在了他的男子汉事业中，无力自拔。而关于这一点，一直对其心怀忌妒的赫尔德在写给他朋友、速写作品《北方



的马古斯》的作者哈曼的信中作出了一些不太友好、但或许是比较正确的评价：

“他现在是真正的枢密参事、议院主席、高等军事专科学校校长，上至土木工程监事，下到筑路主管，同时还是内阁大臣；他是宫廷诗人、寻欢作乐的发起人，宫廷歌剧、芭蕾舞剧、化妆舞剧、各种题词和艺术品的作者；他是医科学学校的校长，在那儿他可以连续举办一个冬季的解剖学讲座；他甚至可以成为头号演员、头号舞者以及魏玛宫廷的总管，要是上帝愿意，他不久便会当上恩斯特宫廷的总管家，而且他有能力得到那儿所有人的爱慕。他已被封为男爵，在他生日那天将会公布这一决定。他从他的园圃搬进了城里，在那儿盖了一所气派的房子，还经常举办一些读书聚会等。所有这一切莫不与他的执政事务有关……”

歌德真的有那么多图谋吗？他曾在三十岁生日前不久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点点成就，我付出了多少，又招来了多少敌人。我的追求、奋斗和努力，是神灵们

有目共睹的，我请求你们不要为此而讥笑。如是万不得已，就用笑声来为我助威。”

一年后，他写信给一位好友、当时身在苏黎士的哲学兼神学作家约翰·卡斯帕·拉瓦特尔：“我每天受委托所做的那些或易或难的工作，需要我保持一颗清醒而又有所幻想的头脑，我越来越珍惜这份职责，我希望它能让我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的存在是一座金字塔，在已经建立了基座的前提下，我意欲将塔顶尽可能地垒得更高。这种欲望超越了其他一切，不容许我有片刻的遗忘。我不能踌躇犹豫，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的生命之舟或许会半路搁浅，犹如未完成的巴别通天塔。至少得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只要我活着，上帝就会给我足够的力量去实现它。”

之后，他又写道：“强制是冷酷无情的，然而惟有强制才能让人显示他内心的力量。信马由缰、浑浑噩噩的生活人人都会过。”

但是，歌德自愿选择的这种管理工作以及冯·施泰因夫人的种种处世准则犹如一件令人

窒息的紧身胸衣最终使他感到难以忍受，他甚至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丝线缠住了翅膀的小鸟。在写给夏洛特·冯·施泰因的信中他这样说道：“我觉得自己有一对翅膀，但它们毫无用处。要是我能摆脱政治斗争，专心致力于科学艺术，那该有多好啊。”正是在这个时候，1780年2月，他的脑海里有了《塔索》的轮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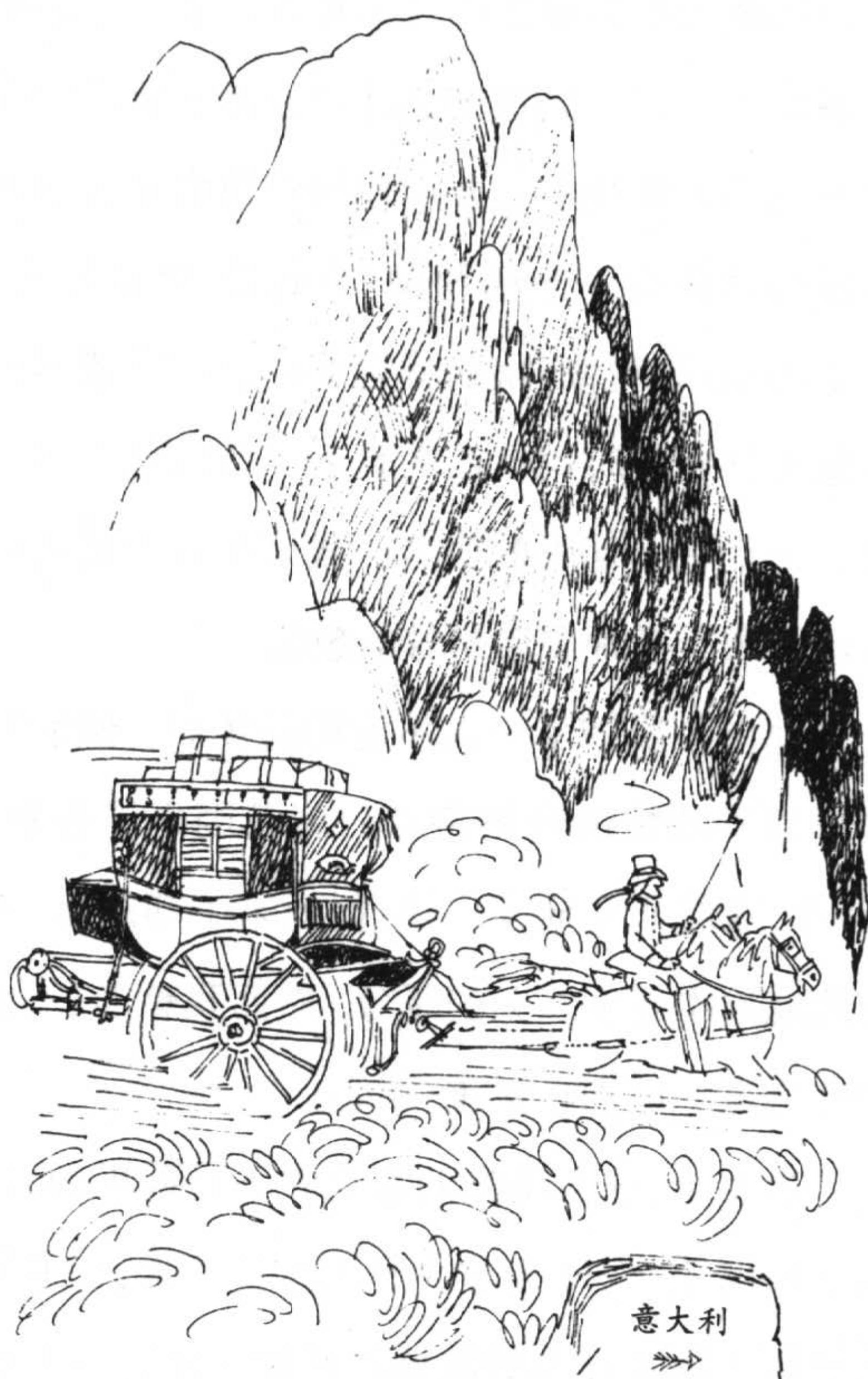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规模研究。三十五岁时，他证实了人体中也存在着至此为止只在动物身上发现的颌间骨。“他的这项研究结果早已表明，生物界中存在着某种进化现象”，传记作家彼特·伯尔纳说，这“比达尔文早了将近一百年”。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他进一步意识到，他忽略了自己原有的兴趣，并在对国家公务的过分热心中迷失了自我。“我着魔般地一脚陷了进去，就如同踏入了一个陷阱”，三十多岁的他这样写道。

他突然间厌烦了这种“义务奴隶”的生活（歌德在1784年3月3日的一封信中如此称道）。他在给公爵的信中说：“我觉得我已经死

了。”他对夏洛特说：“我已是一个无用之人。”当时，他已经决定逃离被他称为“监狱”的魏玛，前往意大利。他认为，只要到了意大利，那些曾经禁锢过他的枷锁和丝线就不复存在了。他悄悄准备好了一切，只把出逃计划告诉了他那信守秘密的仆人塞德尔，并交代他将他的私人信件和钱财转寄给一个叫约翰·菲利普·默勒的人。这个约翰·菲利普·默勒就是他自己；歌德不想在意大利旅行时用自己的真名，所以他想出了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假名。或许在这个做法背后还隐藏着某种脱胎换骨的想法。

他向公爵请了一次不定期的休假，然后向同样毫不知情的夏洛特·冯·施泰因作了告别：“终于，我终于完成了一切；但尚未了却的是，我与此地原本还有八天的缘分。然而我想走了，也向你再道一声别！保重，甜心！”

事实上，这次出逃的起点并不是魏玛，而是卡尔斯巴德。三十七岁生日刚过没几天，在卡尔斯巴德作了短暂疗养的歌德就开始了他这一生中最伟大的旅行。1786年9月3日，他在《意大利



之行》札记的开篇这样写道：“清晨三点，我悄悄溜出卡尔斯巴德。我没有让人发现，否则他们肯定不会放我离开。那群准备在8月28日为我庆祝生日的人或许会为此而将我扣留。不能在此多作停留了。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个旅行提包和一个背囊，翻上一辆邮车，于七点半——一个美妙宁静的起雾的早晨——到达了茨沃塔……”

歌德将这次出行形容为一种在空中连翻三个跟斗的杂技绝活；这是一种死亡之跳——杂技演员小心翼翼地在悬挂在高空中的秋千之间飞舞，一旦与下一个秋千失之交臂，就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对于歌德而言，这并不仅仅是变换秋千，也不仅仅是改变环境，而是一种自我转换，一个新的开始，一次新生。三个月后，12月3日，已经在罗马待了四个星期的他这样写道：“……来到罗马的那一天是我的第二个出生日，这是一次真正的重生。”

歌德在意大利待了差不多有两年。1788年6月18日，当他再次踏上魏玛这片土地时，三十九岁的他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同月，为了在

今后的几年中逐步接管公国的全部科学艺术机构，他辞去了除伊尔默瑙委员会之外的所有公务。如此一来，他觉得自由了很多，也不再受制于各种伦理法规和社会舆论了。年近四十的他不顾魏玛公众的流言蜚语毅然与二十三岁的克里斯蒂娜·武尔皮乌斯的结合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他多年后才正式娶其为妻的克里斯蒂娜为他生下儿子奥古斯特时，歌德已经步入了不惑之年。



**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

“……与你相反，我被  
人从自己的屋里驱逐出来，  
居无定所，到处流浪……”



# “瘦得像条沙丁鱼”

——高更

保罗·高更：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醉心于“原始主义”，对后来的现代主义画派有较大的影响。作品有《黄色的基督》、《两个塔希提女人》等。

歌德也许想做但最终没有做的事——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从原来的生活中脱身而出，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一百年后三十三岁的保罗·高更做到了。时至今日，高更早已是公认的法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从表现主义到青年艺术风格，从象征主义到马蒂斯式的“野蛮人”风格，他的作品一向被视为新式艺术风格的榜样。但是，当高更刚开始决定以艺术为职业、靠绘画谋生并养活妻子和四个孩子（当时，高更的第五个孩子尚未出世）时，他还只是个业余画家。尽管看过毕沙罗作画，但是高更本

人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专业训练。

保罗·高更于 1848 年 6 月 7 日出生于巴黎，在他步入画坛之前即三十岁时已是一名收入颇丰的交易所经纪人。凭着一年 4 万法郎的收入，他和他的家人可以过一种舒适、无忧无虑、近于奢侈的生活。他甚至有能力和购买大量在今天非常昂贵、而在当时相对比较便宜的艺术品。这当中就有他收藏的毕沙罗、莫奈、雷诺阿、吉约曼、西斯莱和塞尚的作品。

虽然高更非常清楚这些画家不能完全靠艺术为生，但有一天他还是向妻子宣布道：“从今往后，我要每天作画，以画谋生。”比他年轻两岁、来自丹麦的妻子梅特-索菲·加德听罢此言，大吃一惊。高更事先并未向她透露过有关这一计划的只言片语，现在他就这样放弃了交易所经纪人这个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利益的工作与身份，就像摆脱了一项“永久性的劳役”一般。梅特自然没有赞成丈夫的决定，也没法理解他的行为。然而，高更坚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只不过，他低估了这其中的艰辛。

过了一年自由的艺术家的生活后，高更和他的家人——在这期间，他们的第五个孩子波拉来到了世上——离开了巴黎，搬到了生活较为便宜的鲁昂。一年后，家里的积蓄花完了。此时已有三十五六岁的高更尚未成功地卖出过一幅画，只好和妻子结束在鲁昂的生活，带着五个孩子来到梅特在哥本哈根的父母家中。尽管如此，高更还是没有放弃原先的打算。他准备先想办法养活自己和妻儿。他应聘做了一个法国帐篷布厂的代销员，在丹麦推销该厂的防水帐篷和遮阳篷。为了支付这次搬家费用，高更还卖掉了自己一半的人寿保险。

在哥本哈根，高更过的是一种完全寄人篱下的生活，妻子的家人对他十分不友好。而他的推销工作也进行得相当不顺利。在经过种种真诚的努力和尝试而一无所获后，高更灰心至极。1885年5月，他写信给当年的同事和朋友埃米尔·舒芬埃克说：“六个月了，我没有跟一个人说过话。我只为自己活着。全家人都视我为怪物，因为我一个子儿也没赚到。现在的人眼里只有

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梅特也不再可爱了，贫困折磨得她痛苦不堪。在这个到处都是熟人的地方，她的虚荣心受到了打击。而我则必须承受所有的谴责……”

这年夏天，三十七岁的高更离开了给人上法语课以贴补家用的妻子，带着六岁的儿子克洛维斯回到了法国。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此后的多年里，高更一直希望能够挣到足够多的钱，让一家人团聚到自己身边。但事实上，他和儿子两人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几个星期后，他写信给在哥本哈根的梅特说：

“狗急尚且跳墙，更何况人。克洛维斯长水痘那会儿，我口袋里只剩下 20 生丁。三天来，我们贷款买干面包吃。——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主意，我觉得我可以去一家广告公司应聘张贴广告单子。老板看到我时，笑了起来。但是我严肃地对他说：‘我的孩子病了，我要干活。’结果，老板给了我这份差事。为了五个法郎，我得每天在各个火车站张贴海报。克洛维斯被我锁在家里，发着烧，躺在床上，而我每天要到晚上才能

回家照料他。这样已经过了三个星期了……”

但是,此时的高更绝不愿意轻言放弃。他经过一切努力把克洛维斯留在了身边。“他恢复得不错”,高更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没有想过要把他送回到你那边。恰恰相反,如果我的广告单子能有所起色,我还想把另外几个孩子接过来。你知道我有这个权利!”

然而,一切事与愿违。而立之年的高更,一方面不愿意放弃他的画家梦,另一方面在经过多次尝试后仍未能找到一份工作,处境每况愈下。不久,他被迫将儿子克洛维斯送回哥本哈根。只是,他对梅特的谴责越来越频繁,因为后者的生活过得比他好。

“我不觉得你的生活状况有那么悲惨。你自己装修漂亮的房子,身边有儿女绕膝;你工作艰苦不易,但其中自有乐趣;你有拜访别人,也有接受别人来访的机会。既然你喜欢和其他女人、和你的同乡在一起,那么你就应该感到满足……与你相反,我被人从自己的屋里驱逐出来,居无定所,到处流浪……”

有一次,梅特在信中告诉丈夫自己病了,卧床不起。高更在回信中只简单地建议了一句:“你不能任其恶化。”随即,便将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抱怨起他自己更为糟糕的处境来:“我现在的体重比你还轻,瘦得像条沙丁鱼……”

这段时期的高更的确毫无运气可言,因为没人对他的艺术感兴趣。四十三岁那年,高更前往南太平洋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旅行。从一位叔叔那里继承了 13000 法郎(从中他只给了妻儿 1500 法郎)后,他再次回到巴黎,并在巴黎筹建了一个画室。他和一名爪哇女子生活在一起,频繁地举办一些画室聚会。

两年后,高更离开了欧洲,此后一直生活在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群岛中一个叫作拉·多米尼加的岛上,直到 1903 年 5 月 9 日去世。此时的高更早已疲惫不堪,还感染上了梅毒。虽然他有不朽的作品问世,但是得到的报酬却少得可怜。因为尽管开始有人对他的绘画艺术感兴趣并且买下了不少他的作品,然而那些艺术品商人的开价一律都很低。1980 年,有人以 290 万

美元的价格将一幅高更的风景画进行拍卖；而73年前，他的《雪中的布列塔尼村庄》在帕皮提的一次遗产拍卖会上却只卖了7法郎。

1920年，梅特也离开了人世。临去世前，她将丈夫的信件交给他们最小的儿子波拉，并对他说：“念一下这些信，你对你父亲会有一个更为公正的评价。假如你认为合适，还可以把这些信公开。你父亲在性情和行动方面都很坚强，但他不知道什么是‘恶毒’，什么是‘不信任’。他或许显得有点无情，那是因为他太诚实，做事时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想法。但是，他一直在默默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从未有过偏激狂热的时刻。从前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成为一名艺术家的，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对的。然而肯定不会有人为我没有留在他的身边、没有在那种对于我来说像冒险一样无望、疯狂的生活中再为他多生几个孩子而感到奇怪。”



**弗朗茨·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797—1828**

“每天晚上入睡时，我都希望不要再醒来；每个早晨来临时，我还带着昨日的忧伤。”



# 艺术家们的首领

## ——舒伯特

弗朗茨·舒伯特：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创作了大量艺术歌曲和室内音乐。一生留下艺术歌曲 600 余首，主要作品有《魔王》、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未完成交响曲》、《C 大调交响曲》等。

与三十岁时还一事无成的高更相比，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在这个年纪却早已有佳作问世。

舒伯特于 1797 年 1 月 31 日出生在维也纳近郊利希滕塔尔的“红虾之屋”中，三十一岁正当出名之时去世。然而，对于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经历过无数次失望打击且一生贫困的舒伯特来说，在这个年龄过世，未必是件可怕的事。只是几年前，当二十六岁的舒伯特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梅毒时，他认为自己的健康从

此毁了,希望破灭,人生也将一败涂地。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觉得自己是最悲惨、最不幸的人。设想一下,一个无法再恢复健康的人,由于绝望,生活将会过得越来越糟;设想一下,一个希望已经破灭了的人,爱情与友谊的幸福带给他的最多只能是痛苦。对于美,他逐渐失去热情。你自问,这是不是一个悲惨、不幸的人?……每天晚上入睡时,我都希望不要再醒来;每个早晨来临时,我还带着昨日的忧伤。没有欢乐,没有朋友,我就这样打发着我的日子……”

足足过了两年,他才渐渐平静下来。他或许已经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但却没有作出任何放弃。由于顽疾缠身,舒伯特经常会感到剧烈的头痛,还受到其它各种病痛的折磨。尽管如此,他还是顽强地工作着,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创作出大量形式各异的音乐作品,这当中有:8首交响曲(第八号h小调就是著名的《未完成交响曲》),15首弦乐四重奏,22首奏鸣曲,6首复活节弥撒曲,此外还有一些歌剧、德国小歌剧以

及数目众多的歌谣和颂歌。舒伯特在工作时十分专心，即便是他的病痛也不能使他停止每天从清晨开始的六至七小时全神贯注的谱曲工作。他的谱曲速度很快，往往是刚完成一曲，就能马上开始下一首。

舒伯特其貌不扬，身高只有 152 公分，他因此而得以免服兵役。“只要再好看一点点，他就会成为妇人们的宠儿”。舒伯特的一位传记作家曾这样评价道。他甚至认为，舒伯特那一头卷曲的黑发、一对饱满的嘴唇以及那个块状大鼻子令他在外貌上极像一个白皮肤的黑奴。“只要有一点点好胜心，沙龙就会为他而开放……”然而，舒伯特在社交方面却无此野心。他并不看重别人对他的评价（朋友除外）。为此，他索性忽略掉外表的好坏，任何时候都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由于饮酒过度，年仅三十岁的他就已经长了一个啤酒肚和一张虚胖浮肿的脸。

“假如能再多点自信，不要那么拘束，他就会成为艺术家们的首领……”——弗朗茨·舒伯特生性腼腆，且从未克服掉他腼腆的毛病。他的

一位同时代人曾经这样对他说道：“您的身上还有一些东西尚未挖掘；然而您太不会演戏，太不会耍手腕。您在任意挥霍您那美好的思想，却从不考虑该如何利用它。太不会演戏，太不会耍手腕……”事实上，他也渴望得到承认，获得荣誉。只是，他走的是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在这一路上，他只凭成就说话。

舒伯特的工作强度很大，他总是从清晨开始，一直工作到中午。所以，下午的时间他一般用来到处走走，以此来放松心情。他经常出去散步，去咖啡馆看报或跟朋友进行聚会。舒伯特性格冷淡稳重，从不干涉旁人之事，或许就是这一点为他赢得了很多朋友。他的那种为人处世的生活方式不太可能引起朋友和熟人的嫉妒，更不会被他们视为竞争对手。

得不到女人的宠幸——他的初恋情人嫁给了一位富有的面包师——也许是他所受到的所有怠慢中给他打击最大的。爱情是他终其一生都在梦想的东西。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肌肤之亲，后者对他来说无足轻重。然而，也正是肌

肤之亲才让他感染上了那种令当时的医生无计可施的疾病,过早地摧毁了他的健康。

一开始,他把自己的病视为上帝发怒的一个信号,对他行为不羁的一种惩罚。他乞求上帝赐予他死亡,让他能以纯洁之身得到重生。

三十岁的舒伯特身体状况曾经大有改观,他一度以为自己的病很快就会彻底痊愈。然而相隔不久,他就患上了一种与伤寒类似的传染病——“神经热”;对此,他早已虚弱不堪的肌体再也无法凝聚起足够的抵抗力。尽管如此,病中的他还曾向他的知己弗朗茨·冯·绍贝尔借书看。他在给绍贝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绍贝尔,我病了。已经有 11 天了,我滴水未进,虚弱不堪,踉踉跄跄地游移于沙发和床之间。里娜照料着我。我一吃东西,就会吐个精光。

在这个充满绝望的时刻,我请求你能帮我搞到几本读物。我曾读到过库珀的一个关于莫希干人、间谍、领航员及移民的故事。如果你有库珀的书,就把它们交给咖啡馆的冯·博格纳夫

人。我那谨慎仔细的兄长将会认真地把它们转交于我。其他人的书也可以。你的朋友舒伯特。”

一周后,也就是 1828 年 11 月 9 日,下午 3 点钟,弗朗茨·舒伯特去世了,享年三十一岁零九个月。评估员根据其父兄的证词在官方的遗产记录中记下了以下一些不值钱的家当:3 件布制的燕尾服,3 件小礼服,10 条长裤,9 件背心,1 顶帽子,5 双鞋,2 双靴子,4 件衬衣,9 条围巾,9 块手帕,13 双袜子,1 条床单,2 张床罩,1 个床垫,1 个软垫,1 床被子。

上述物品最后被估价为 53 个古尔登(德国古代金、银币名)。

除此之外,舒伯特还留下了一些旧乐谱。官方的遗产记录最后这样写道:“除了几本价值为 10 个古尔登的旧乐谱,被继承人没有其它遗产。”

这几本被估价为 10 个古尔登的“旧乐谱”就是弗朗茨·舒伯特的作品。一共一千一百多部作品,其中有:十四部歌剧、九部交响曲、一百多首合唱曲、五百六十七首歌曲等大量音乐作品。

他最擅长的是艺术歌曲的写作，因此有“歌曲之王”的美誉。他的《未完成交响曲》、《C 大调交响曲》、《死于少女》四重奏、《鳟鱼》五重奏、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姑娘》、《天鹅之歌》以及剧乐《罗沙蒙》等，都享有盛名。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

……另一幅图景就  
是将众多的文化融合成一  
种包含一切在内的世界文  
化……



# 不朽的楷模

## ——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国王，  
先后征服希腊、埃及和波斯，入侵  
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是啊，我的朋友，成大器得靠年轻啊。拿破仑三十岁时就已经赢得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尊敬”。七十八岁的歌德在一次谈论拿破仑——他一生钦佩的人——的时候这样对艾克曼说道。与晚年相比，年轻时候的歌德也是办事效率极高的人。戏剧《斯泰拉》他只用短短几天就完成了；而现在，要是一天下来能写上巴掌宽的文字，他就会兴奋不已。

两千多年前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的确是一个凭着年轻的力量获得成功、摘取荣誉的不朽楷模。三十岁的亚历山大几乎逾越了他事业的高峰，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其时的他，身体已不如前几年从马其顿出发开始其独一无二的

凯旋之征时那般强壮了。

亚历山大年仅二十二岁时,他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浦二世在培拉被人谋杀。他在继承了王位后,便一头冲向战场。占领整个希腊后,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34 年率领军队渡过赫勒斯湾(达达尼尔海峡),开向小亚细亚和曾在特洛伊战争中为希腊所攻占的伊利厄姆,攻打波斯国王大流士;接着向南挺进,穿过叙利亚,长驱直入埃及。在埃及,他被封为阿蒙之子,即上帝之子;接着又调头向北,取道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进驻美索不达米亚,在此地的高加梅拉战役中再次并最终打败大流士,占领整个波斯王国。之后,进入兴都库什山脉,占领大夏和粟特。此时已三十岁的亚历山大来到了印度河畔,准备继续前进,攻占印度。

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亚历山大重建统治秩序,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新建了许多像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市那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对这次辉煌的凯旋之征做出贡献的不仅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军官,还有武器专家和道路

建筑师以及众多随军出征的医生、管理专家、文书官员、档案保管员、科学家、哲学家、诗人及历史学家。这次凯旋之征不仅受到亚历山大的老师、教他学会科学思维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也凝聚着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将世界希腊化的愿望。

然而，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亚历山大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一个战胜者单向地镇压被战胜者的文化、用战胜者自身的文化——即用希腊的神、希腊的哲学、希腊的艺术及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来“赐福”并将被战胜者从他自己的文化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在年轻的亚历山大大脑中呈现的是另外一幅图景，也就是将众多的文化融合成一种包含一切在内的世界文化；这种融合同时也是各个民族间的融合，最主要是希腊、马其顿和波斯人民的相互融合。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亚历山大和试图对出征在外的弟子施加影响的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决裂。对于身为希腊人的亚里士多德来说，包括具有高度文明的波斯人在内的所有异族都

是野蛮人，他们都是生而为奴的，因此，任何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都是正确的、有理的。而生为马其顿人的亚历山大——希腊人从未用平等的目光看待过他的父亲——却认为非希腊人并非二等公民。三十二岁的亚历山大在苏萨（今舒什）举办了一次集体婚礼，他的1万多名士兵娶了当地的妇女为妻。他本人则于三年前娶了一名大夏贵族的女儿罗克萨纳为妻。在苏萨的这次盛会上，他又与两名波斯女子——大流士三世的一个女儿和阿塔克赛克塞斯三世的女儿——结为夫妻。公元前324年的苏萨集体婚礼以及亚历山大本人与波斯公主的结合，体现了他那“王寇”相融合的想法。

然而，亚历山大再也没有时间在被他征服的土地上重建秩序了。此时亚历山大的士兵已厌倦了长期的紧张战争，再加上印度的炎热、暴雨和疾病，他们拒绝前进，要求回家。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发生哗变，印度的土著居民也群起反击。亚历山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公元前325年，将大部队撤出印度。公元前324年初，

亚历山大的部队退至巴比伦境内的奥皮斯城，由于长途跋涉，损伤极大。将近 10 年的亚历山大远征，终于结束了。以巴比伦作为首都，他庞大的帝国西起希腊、马斯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在巴比伦，亚历山大还整编一只庞大的军队，将 3 万波斯青年编入马其顿部队，计划再次远征亚洲。但不幸的是公元前 323 年 6 月，亚历山大突然患恶性疟疾，从发病到生命结束仅 10 天时间。他匆匆离开了世界。



**克娄巴特拉七世**

**Kleopatra VII**

**69—30 BC**

这个女人身上真正出色的是她的智慧和精力。

# 被人艳美的富婆

## ——克娄巴特拉

克娄巴特拉七世：埃及著名女

王，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二世的次女。

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中还包括了从那时起开始统治埃及的托勒密人。托勒密人的最后一名王位继承人是公元前 51 年至公元前 31 年在位的埃及女王、臭名昭著的克娄巴特拉七世。她的父亲托勒密十二世死后，年仅十九二十岁的克娄巴特拉与其兄长托勒密十三世开始上台执政。然而几年后，克娄巴特拉为后者所逐。公元前 48 年，克娄巴特拉投奔当时世界上势力最为强大的恺撒；后者在其请求下率领军队进驻埃及，并在亚历山大战役中击败了托勒密十三世。托勒密在这次鏖战中命丧黄泉。之后，恺撒将埃及的统治大权交还给二十三岁的克娄巴特拉和她年仅十二岁的弟弟托勒密十四世，同时将塞浦路斯岛一并赠送。然后，两人带着大量船队沿

尼罗河向上,(或许是作为一次军事佯攻)穿过整个埃及。而在恺撒和克娄巴特拉眼里,这次航行同时又是一次奢华的盛会。在克娄巴特拉装饰精美的国舟上,两人相爱了。

恺撒离开埃及后,克娄巴特拉怀孕了。没过多久,她生了一个儿子,为他取名托勒密-恺撒。这个名字正式证明了他是恺撒的儿子。据传,恺撒本人也承认了这个被亚历山大人称为恺撒里翁(即小恺撒)的儿子。只是托勒密-恺撒是否确实为恺撒之子,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这在当时是一个涉及到几年之后的继承权的重大问题。三十岁时,克娄巴特拉生了一对双胞胎——亚历山大·赫利乌斯和克娄巴特拉·泽莱纳。双胞胎的父亲是当时已遭人谋杀的恺撒的战友兼继承人马克·安东尼。克娄巴特拉在罗马生活了两年,于恺撒死后重回埃及,三十三岁那年与安东尼结婚。马克·安东尼是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帝国西部则由屋大维,也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统治。

克娄巴特拉对安东尼的亲近,并非像很多小





说、戏剧和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出于爱情的力量。这场婚姻首先有其政治原因。克娄巴特拉穷其一生都在追求重建托勒密大帝国的目标。为此,她先后求助于恺撒和安东尼。而安东尼为了击败与其矛盾日益尖锐的政敌屋大维,同样也需要来自克娄巴特拉和埃及人民在政治上的帮助。此外,在这场游戏中还有一点不可忽略,那就是:三十岁的克娄巴特拉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是的,她的确非常富有——父亲留给她的遗产已经超过了强大的罗马人所拥有的一切,更何况她一刻不停地在考虑着这笔财富的增值问题。她不仅有能力向罗马人提供粮食和船只,甚至还可以资助安东尼挑起对屋大维的战争。

历史记载明显有误的一笔就是,把克娄巴特拉描述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性感尤物。在毫无节制的熏心利欲的驱使下,她几乎杀光了自己的家人,然后——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这样写道——“向外实现其杀戮思想”。克娄巴特拉利用爱情这一手段使得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一个接一个地拜倒在她的脚下。只有少数几人能够

“抵御”住她的魅力及“淫荡行为”。此外,人们可以从来自同时代人的描述中得知,她的那种所谓美丽,事实上“既不惊人,也并非无与伦比”。这个女人身上真正出色的是她的智慧和精力。

她精通包括埃及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她的母语是希腊语,更确切地讲,是马其顿语——一种希腊方言。把克娄巴特拉当成埃及人的任何想象都是错误的。她像所有的托勒密人一样有着马其顿的血统,她的血管里——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格兰特这样认为——可能没有一滴埃及人的血。她懂得许多有关管理技术的知识,在金融、政治领域颇具天赋,是当时的农业及炼金术专家。三十四岁的她非常懂得如何从安东尼送给她的杰里科周围及腓尼基沿海的土地中获取利润。她让人在这些土地上种植植物,然后加工成在当时极受欢迎的香膏;又从杰里科附近的死海中提炼天然沥青。这些东西同样给她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克娄巴特拉还将土地出租给希律大帝,以此获得较高的赢利分红。

据说,克娄巴特拉还会炼金。而比较肯定的

说法是,她在化妆品方面也很在行。有人在一篇被认为是由她撰写的论文中发现了一个防脱发的配方:“以下将要介绍的是一种防脱发的最佳药剂,可配合油或润发脂一起使用,以求达到最佳效果。该药剂同样能有效防止睫毛脱落及一般的毛发脱落。它具有神奇的力量:烧成灰烬的老鼠一份,烧焦的葡萄一份,烧成灰烬的马齿一份,一份熊脂,一份鹿的骨髓,一份芦苇壳。将上述成分中干燥的那一部分在研臼内捣碎,加入蜂蜜并搅拌成一团。再加入融化后的熊脂和鹿骨髓,将混合药剂倒入黄铜瓶,涂在无发部位,直至长出新发。”

三十五岁那年,克娄巴特拉为安东尼生了第三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的儿子托勒密·费拉德尔弗斯。五年后,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角战役中打败了安东尼,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自杀身亡。战胜后的屋大维命人杀了克娄巴特拉的儿子、传说中的恺撒之子恺撒里翁以及她和安东尼的两个儿子。只有女儿克娄巴特拉·泽莱纳活了下来。



**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推动历史前进的车  
轮，这一使命在我看来相当  
艰难……”

## 第一次战役就临阵脱逃

### ——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第三代国王(1740—1786)。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和领导统一德意志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其三十岁时并没有多少功勋记录在册。腓特烈二世生于1712年1月24日，二十八岁登上王位。在位期间，他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举动就是偷袭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在他两次进攻毫无防备的奥地利后，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长女)被迫在1742年的布雷斯劳——柏林和约中同意由普鲁士吞并西里西亚。

确切地说，这次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并不能归功于腓特烈本人。恰恰相反，在1742年4月10日与奥地利军队对阵的莫尔维茨战役中，这位年轻而渴望得到荣誉的普鲁士国王没有做到

尽守职责。战役开始打响是在这一天的正午时分,腓特烈亲任总指挥。然而四小时后,随着奥军骑兵部队一次漂亮的进攻,普鲁士军队内部开始混乱起来,一部分人甚至打算临阵脱逃。腓特烈以为战役失败了。因此,当陆军元帅什未林建议他逃命时,他便带了少数几名随从仓促离开了自己的军队。途中,他还把战役失败的消息告诉了一支辎重部队,而后者闻罢此言便丢盔弃甲,狂奔逃逸,以免性命、自由不保。

在此期间,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距腓特烈逃离仅一小时后,陆军元帅什未林即派信使告诉他,承蒙上帝之助,战役还有胜利的希望。可是,腓特烈逃得太快太远,信使最终未能赶上。在接下来的十个小时内,人们根本无法找到这位最高军事将领。

在亡命途中,腓特烈还差点成了奥军的俘虏。当时,腓特烈及其随从到了奥波莱,要求士兵打开城门让其入内。然而,直到他们听到城门口有枪声响起、意识到自己已成了被攻击的目标时,才发现奥波莱已为奥军所占领。慌乱中,

他们又朝刚才过来的方向往回逃了三分之一路程,并相信战役确实失败了。凌晨两点,当他们在勒文的一间屋子找到落脚点,一行人精疲力竭地喝着咖啡,而腓特烈在极度的紧张中来回踱步,并不时地发出“上帝啊,太重了,你对我的惩罚太重了”的哀叹时,终于传来了什未林扭转战局并最终击败奥军的捷报。身为国王的腓特烈当晚便启程返回曾被他抛弃的军队,于黎明时分见到了刚刚取得胜利的士兵们。

三年后,腓特烈写了一些有关这次战役的东西。他虽然承认“我的行为应该受到诅咒”,并且列举了一系列他所犯下的军事失误,但是有关自己临阵脱逃一事,他只字未提。他在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莫尔维茨让我学到了很多東西。我对我的失误进行了彻底而全面的反思,相信以后会对我有所帮助。”他或许是对的,因为可以肯定的是,腓特烈在他以后所经历的多次战役中再也没有失控过。

尽管腓特烈在经历了这场历时 20 个月之久的战争(这是他所经历的第一场战争,以后还



有更为艰苦、历时更长的战争等待着他)。重回家园后仍然过着像从前一样的生活——写诗、作曲、研究哲学、大兴土木(波茨坦的无忧宫就是在此期间由他设计并建成的)以及与伏尔泰书信往来,但是他毕竟有了变化,而且变得与原来很不相同。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尽管三十岁的腓特烈在察觉到自己在军事以及对外政治中的重要、非己莫属的地位时非常之兴奋,但他毕竟是个聪明人,他能全面地审视自己在这极其可疑的政治游戏中扮演的新角色,认识到它的危险性。这一点从1742年5月腓特烈在波西米亚取得霍图西茨大捷后,写给他的朋友约尔丹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你的朋友就这样在13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成了胜利者。几年前,谁会想到,你的哲学学生、在雄辩术方面西塞罗的弟子及理性学方面培尔的学生有一天会在世界上饰演一名军事人物?谁又会想到,天意竟然会选择一位诗人来颠覆欧洲的体制,让他彻底打乱国王们在政治上的如意算盘?……我焦急地期待着你的消息。但

是，多给我写些有关建筑、家具和舞者的内容吧。它们能让我心情舒畅，让我无须时时刻刻埋头于那些可能重要、却相当烦人的事务之中。我抓住一切机会尽情阅读。我向你保证，即使在战场的帐篷下我也会以和塞内加一样的哲学思维考虑问题，有时比他更甚……”

在这封信中他还强调了新使命的重要性以及完成使命的压力所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这一使命在我看来相当艰难……我经常回想起雷穆斯贝格和当时那种为了探索科学及艺术的奥秘而心甘情愿做出的努力。但是，毕竟每种身份都有它的艰辛。那时的我经历过微不足道的快乐，也经历过同样微不足道的命运的打击。那时的我身处宁静的内陆水域；而现在，我正扬帆驶向浩瀚的大洋中心，一个巨浪将我抛至云端，下一个将我打入无底深渊，而第三个则使我更快地登上巅峰。这种剧烈的灵魂波动不是为哲学家创造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要做到面对命运的浮沉保持沉着镇定，凭一颗常人之心去摆脱每一种感受，是相当困难的。幸运时面露

冷静、不幸时无动于衷的尝试都是徒劳的；表情或许可以作假，然而人本身，他的内心、他心灵中最隐蔽的角落，并不会因此而少受一分震动。”

腓特烈在信的末尾写下了自己的心愿：“但愿成功不要泯灭了我内心一直信奉的人性和美德，这是我梦想的全部。我希望且不揣冒昧地认为，在朋友们眼中，我还是原来的我。”

几个月前，腓特烈曾致信伏尔泰，在谈及自己军队统帅这一角色时，他的口气则少了几分狂妄：“您的诗篇非常动人，只是我已累得不能作答。我快冻僵了。您想了解一下我的生活方式吗？我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一直在行军，接着是午餐时间，之后就是工作。我要接受无聊的拜见，然后是一大堆无聊透顶的公事，这当中包括：安抚难以对付的人，管束性情急躁的人，调动懒虫的积极性……用法律约束抢劫成性的人，倾听空谈家的长篇大论……这些就是我的工作。由衷地讲，如果不是荣誉感作祟，我真想把这些事情交给别人去做……”

事实上，腓特烈的荣誉感对作出入侵西里西亚的决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短短几年后，当他在战场上的胜利为他赢得了“腓特烈大帝”这一别名时，荣誉于他顿时变得无聊而乏味了。年近三十七岁的腓特烈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一生劳累，就连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也不及我……”但是，从那时起他又做了足足 37 年的国王，为他的国家赢得并巩固了在欧洲的大国霸权地位。



**玛丽亚·特蕾西亚**

**Maria Theresa**

**1717—1780**

作为一名女性统治者，  
她在应付繁忙的公务的同  
时，还得担负起妻子和母亲  
的使命。

# 年仅三十的九子之母

——玛丽亚·特蕾西亚

玛丽亚·特蕾西亚：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女王（1740—1780），神圣罗马帝国弗兰西斯一世的皇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之母。

腓特烈通过鏖战从他的劲敌手中夺走了西里西亚省。他的这位劲敌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长女、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17年5月13日出生于维也纳，二十三岁时不得不从她英年早逝的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笔厚重的遗产。从那时候起，她不仅成了哈布斯堡王室及其广大领地的主人，同时也成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两项相加，她的领土范围覆盖了从奥属尼德兰至特兰西瓦尼亚、从北德意志至南蒂罗尔之间的广阔区域以及帕尔马公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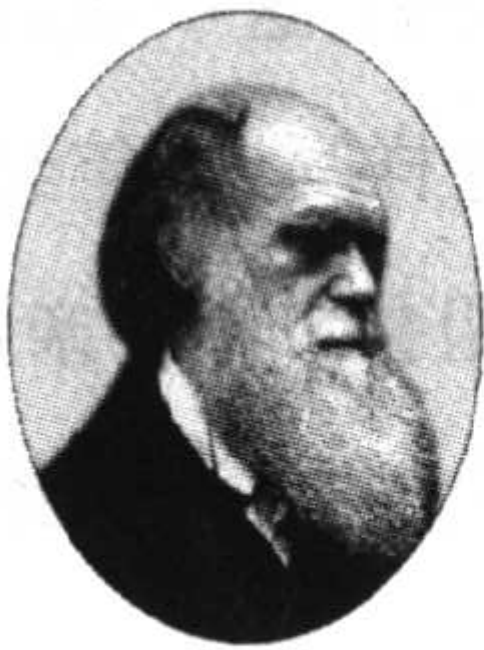
和托斯卡纳两地。十九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嫁给了1745年成为查理七世王位继承人的洛林公爵、托斯卡纳大公弗兰西斯·斯特凡。作为一名女性统治者，她在应付繁忙的公务的同时，还得担负起妻子和母亲的使命。而弗兰西斯·斯特凡名义上虽然是其妻子的共同执政者，但事实上他不仅将统治事务的重担全部推给了妻子，还让她怀了16次身孕。第十六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在七年战争刚刚爆发时，此时的玛丽亚·特蕾西亚正好三十九岁。

玛丽亚·特蕾西亚曾经给她的儿女们(其中有几个很早就夭折了)写过很多封长信，还下令让陆军元帅包贾尼亲王做其长子、十岁的王位继承人约瑟夫的教师。这一切无不显示了她对儿女的关怀。她亲力亲为，关心着他们的教育、前途和幸福；而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即使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她的大多数孩子早早地结婚离家后也不曾减少过。在给包贾尼的那道行文很长的命令中，这位母亲不厌其烦地向陆军元帅阐述了在教育约瑟夫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在她看来,约瑟夫“从小就生活在极度的温馨与疼爱中”,“他的意愿和要求从各方面得到了满足”,他的仆人对她过于谄媚,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玛丽亚·特蕾西亚这样写道,年纪小小的约瑟夫在他人面前举止“粗鲁”,不甚亲切。他必须改掉这种习惯,必须学会服从别人,控制自己。

尽管玛丽亚·特蕾西亚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但她还是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身上的缺点。她对丈夫也很严格,虽然她同样深爱着他。他的某些缺点确实无法让人视而不见,但她还是容忍了下来。这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他那数不清的、一度令她伤心不已的婚外恋。她的顾问塔罗卡伯爵曾向她这样建议道:“夫人,我们应避免包括悲伤在内的任何一件让我们自己耗费精力的事情。不要忘记全欧洲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必须亮出一种鄙薄他们的姿态。”





**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孩子，永远的伴侣，他们关心我们，我们疼爱他们，跟他们一起玩耍，肯定强过一条狗。”

## 结婚,还是独身?

——达尔文

查尔斯·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者和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

英国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以其进化论闻名于世，他的学说对一切有关生物学和创造史的通行理论进行了置疑。达尔文比那位有着强烈荣誉感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晚出生100年，于1839年的2月12日度过了他的三十岁生日。生日的前几天(1月29日)，他在日记中用简短的一句话记下了一件人生大事：“今日在梅耶成婚，三十岁，回伦敦。”

达尔文本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要不要结婚”这个问题进行了纯理论的反复权衡，并把考虑结果提纲挈领地记了下来：“孩子(假如上帝喜欢的话)，永远的伴侣(垂暮时的快

乐),他们关心我们,我们疼爱他们,跟他们一起玩耍,肯定强过一条狗。一个家和一个收拾屋子的人,诱人的音乐和与妇人闲聊的惬意,以上种种对于身体的健康都有好处。但是,时间浪费太多,假如孩子过多,就不得不为养活他们而想法去挣钱。

假如我明日结婚,购置及装修一幢房子得花费多少精力和金钱!如果不得不天天陪妻子散步,那我怎么可能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无法学习法语,看不到那个新大陆,去不了美洲,再也没有可能乘气球上天……

优点:可以自由地进行旅游,与俱乐部的聪明人士进行交流,只是工作太多对身体不利。若没有亲朋好友的关怀,工作又有何益?除了亲人,谁又是既亲又近的朋友呢?天哪,像一头工蜂那样度过一生,只有工作,别无其他,这事想想就让人无法忍受。不行,不能这样。想象一下,要么在伦敦的一间烟雾缭绕、脏乱不堪的寓所内孤独地度过一生,要么找一个温柔可爱的妻子陪伴在沙发上、壁炉旁,有书,或许还有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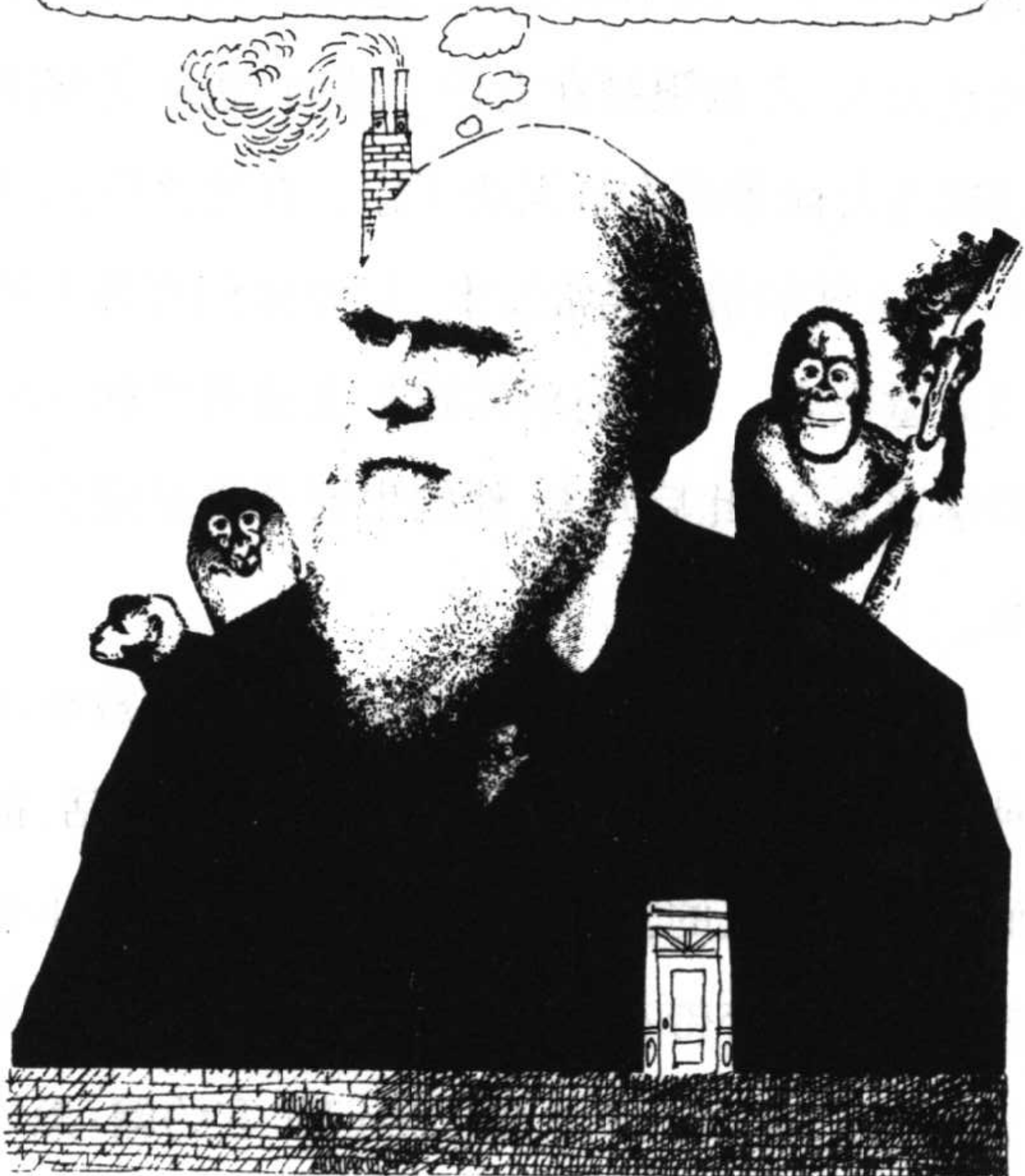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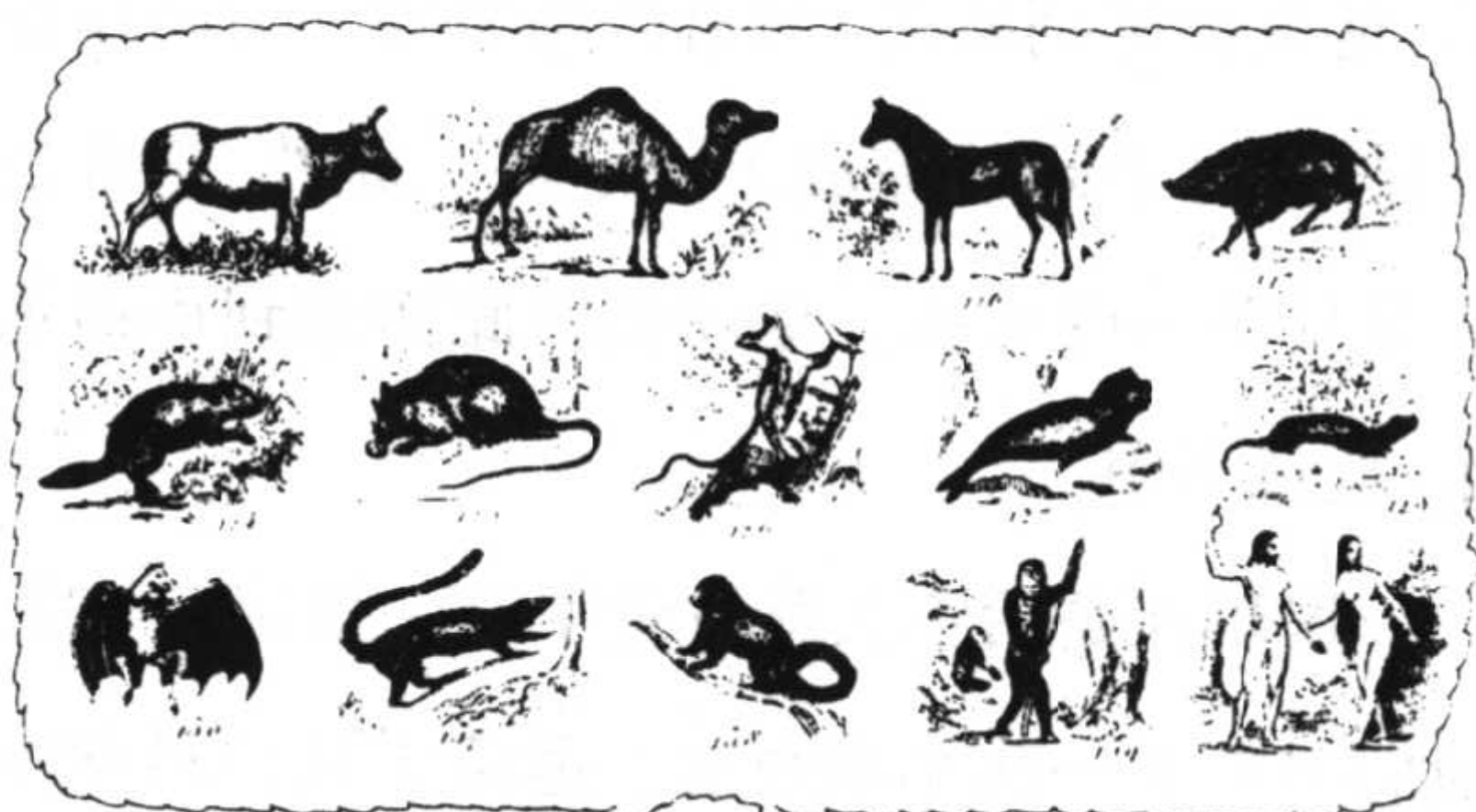
将这样一幅图景与马尔伯勒街的黯淡现实相比较……”

就这样，尽管有着从此“要为生存而奋斗”的恐惧，达尔文还是得出了最后的结论：“结婚，结婚，结婚！”达尔文知道，即使自己从此不再工作，也完全可以靠从父亲——一名事业有成的医生——那里继承的遗产来养活自己。但是，要和妻子两人过一种合乎身份的生活，仅仅靠这笔财产就不够了。尽管如此，达尔文还是决定结婚，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在于那位他为之作了种种考虑的女人——他从小就认识的表姐埃玛·韦奇伍德。查尔斯·达尔文生性胆小怕事，做事总是处处求稳，从不冒险。在结婚这件事上，他或许相当确信，约西亚姨夫的女儿、比他年长一岁的埃玛会成为他母亲般的朋友——而事实上，在以后的岁月中埃玛确实做到了。达尔文在他临终前所说的话就证实了这一点：

“她始终是那么善解人意，并且以极大的耐心容忍着我由于身体不适及生活状态不佳而发出的永无休止的抱怨……我惊讶于自己所拥有

的那一种不寻常的幸福——一个道德素质远在我之上的人竟然心甘情愿成为我的妻子。若没有她，我这一生将是病魔缠身、悲惨不幸的一生。于我而言，她既是一位明智的顾问，也是一名开朗的劝慰者。”

确实，如果没有埃玛这个妻子（作为肖邦学生的埃玛有着相当高超的钢琴演奏技艺），达尔文不可能完成他的煌煌巨著。他需要一个保护着他、时时给他安全感的人。达尔文在工作上一一点都不倦怠；非但不倦怠，他在高强度工作的同时还保持着对工作的浓厚兴趣。结婚前，他不仅修完了神学的全部大学课程（医学课程没有修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医生），还乘坐一艘名为“比格尔号”的帆船前往南美洲及太平洋进行了历时五年的考察旅行，获得了大量有关地理和生物学的资料。这次航行成了他终生事业的一个基点。旅行归来不久，他便为其 1859 年完成的代表作《物种起源》整理出第一批笔记，还发表了自己的旅行日记《一名自然研究者的环球旅行》。



然而，达尔文不能长时间工作。工作时间一长，他就会感到疲乏。只有严格遵守一天的作息安排，他才有可能完成工作定额。此外，正常的作息只要一受干扰，他就会因此而感到负担重重、疲惫不堪。

埃玛在婚后不久就发觉了这一情况。当时，他们举办了一次小型晚宴，邀请了几位科学家及其夫人，人数限制在七位。然而，达尔文却因这次晚会而累得次日无法工作。在这之后的日子里，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只要他们有客来访或应邀做客，或者有时候达尔文独自参加一些科学家聚会，此后几天，他的生活节奏必定会大乱。

为此，达尔文和他的妻子一致决定放弃这种交际性的生活。为了过上真正的宁静生活，他们舍弃了城里的公寓，在伦敦以南的一个小村庄购置了一套带花园的房子。三十三岁的达尔文“找到了他的养老之地”，传记作家约翰·黑姆勒本这样写道。在那里，他和他那迅速壮大的家庭一起生活了40年。他的10个孩子中有8个

出生在这里。这些孩子的出生以及达尔文本人著作的发表,是他那“犹如时钟一般工作不止的人生”(达尔文语)中惟一的几次停歇。

然而,即便是生活在乡下,即便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庇护,日常生活中作息安排的任何一种变动,还是会打乱他每天两次在特地为他铺设的小路上散步这种为他所习惯了的生活节奏。程度再轻的激动也会令他旧病复发。头疼、虚弱、胃疼、频繁的呕吐,所有这些病痛使得他每天只能工作四小时。

在另一方面,经常性的身体不适(不排除是某种神经症的可能),成了他赖以逃避外部世界及其各种要求的防护堤。达尔文三十九岁那年,他十分敬重的父亲去世了。他没有出席葬礼,理由依然是“身体不适”。

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有生之年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乡下的别墅。“我与我生命终结的地方紧紧相连着”,三十五岁的他这样写道。七十三岁时,达尔文在别墅去世。就像三十岁的他所预料的那样,他最终没有去美洲,没有登上那片



新大陆,也没有乘气球飞上天。他也没有学习包括法语在内的其他任何一门语言。他曾学过一段时间的德语,但没有多少成效。只是即使他没有结婚,没有成为 10 个孩子的父亲,他大概也不会学习德语和法语,不会驾驶气球上天,他大概也不会有其他的成就。



**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结婚，虽然值得向往，  
然而于我而言却是最不可  
能的事。”

# 在生活与思想的小径上同行

——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19世纪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现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

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三十岁刚出头时也曾动过结婚的念头，身为巴塞尔大学古典哲学教授的他，想通过婚姻使自己的生活的安定下来。1844年10月15日出生在吕茨恩勒肯的尼采，凭借他的论文《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以及到那时为止已经发表的三部《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学者。但是由于可能是在学生时代感染上了梅毒，这时的他身体健康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尼采早年就患有剧烈的头痛和眼痛，这两者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濒于绝望。为了减轻病痛，大哲学家不得不

经常前往气候条件适宜的瑞士和意大利两地进行疗养。对于这件事,理查德·瓦格纳有其比较独特的见解,在一封写给尼采的长信中,他恳求这位年轻的朋友改变生活方式,还邀请他去拜罗伊特的家度暑假:

“您的来信又让我们为您担忧起来,”他在回复一封尼采提及自己压抑情绪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妻子将会在近期内给您写一封更为详尽的信。我则想利用眼下节日中的一点空闲时间告知您——也许会惹您生气——一些我们有关于您的言论。此外,我敢说,在我的生活中从未出现过您在巴塞尔的晚上所做出的那种举动。假如你们都是疑病患者,那么这点自然不重要……我的意思是,您要么结婚,要么动手创作一部歌剧,两者对您会有同样的帮助。我认为结婚更好。我暂时可以向您推荐一种止痛药,但是您的药箱总是被您布置得没法装药。要是您暑假来我家,我们可以在家里为您提供住处——这可是在我生活最窘迫的时候也未曾享受过的待遇。”

尼采到了第二年才去拜罗伊特,但是在那儿感觉并不是很好。他写信向妹妹抱怨道:“我渴望着离开……我害怕那些漫长的艺术晚会……这一切令我厌烦透顶。”之后,他逃进了巴伐利亚森林。

尽管如此,尼采在此期间还是对婚姻问题进行了一番考虑。1876年4月,他在日内瓦湖畔疗养期间匆匆结识了一位年轻的荷兰女子,他给她写去了一封求爱信:

“我的小姐!……鼓起您心中所有的勇气,不要畏惧我在此对您的发问:您愿意嫁给我吗?我爱您,并且感觉您已归属于我。不要对我的突兀有所微词!至少在这件事上谁都没错,谁也无须为任何事辩解。然而,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也有与我一样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并不陌生,片刻的陌生也未曾有过!难道您不认为,对于我们来说,结合后的生活会比单身时更轻松更美好吗?您愿意试着与我——一个怀着一颗真心追求解脱与美好未来的人——同行吗?在所有生活与思想的小径上结伴同行?坦率一点,不要

矜持。除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冯·森格先生,没人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也没人知道我向您的求婚。明日 11 时左右我将坐快车回巴塞尔,我必须回去。我在巴塞尔的地址已随信附上。假如您能同意我的请求,我就马上给您母亲写信(这样我就得跟您索取她的地址了)。下决心尽快决定吧,回答‘愿意’或‘不愿意’——明日 10 点前请写信至我下榻宾馆的收发室——愿永远为您祝福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有好运。”

尼采的求婚信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被那位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荷兰女子所接受,这一点毫不奇怪。此后,他的健康状况又有了进一步的恶化。一年后,尼采又想通过结婚走出困境。当时,他到了索伦托。1877 年 4 月 25 日,他在信中对其妹妹说,他和几年前在拜罗伊特认识的马尔维达·冯·迈森堡小姐一致认为,放下巴塞尔的教授职位、全心考虑如何娶上一位富家小姐应是眼下最该做的一件事:

“我的身体糟糕透了! 14 天里我有 6 天躺在床上,承受了 6 次病痛发作,而最后那一次是

让我如此地绝望……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冯·迈森堡小姐视之为不可变动并且需要你的帮助才能得以实施的计划;我们坚信,我在巴塞尔的现状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它将会耗尽我全部的健康和更为重要的人生计划。当然,下个冬季我还是得在那儿挨过。但是,到1878年的复活节时,如果另一项组合能够成功的话,这一切将会有一个终结。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能娶到一位既适合我,又足够富有的妻子,就像冯·迈森堡小姐所说的那样,‘人好,而且还要富有’。她说的‘而且’这个词被我们笑了好久。罗马是一个适宜我恢复健康、发展社交和潜心钻研的地方,我将与她一起在那儿生活几年。按计划我应该在今年夏天在瑞士完婚,这样我就可以在秋天时带着妻子回到巴塞尔。被邀请来瑞士参加婚礼的各式各样‘人’中,有一些你完全不认识,如来自柏林的埃尔泽·比洛、汉诺威的埃尔斯贝特·布兰德斯。我喜欢他们的精神品质,我们的心灵能达到最完美的契合。……赞美,荣誉与歌颂!然而,事情到底怎样发展下去还是令人担忧。还

有,钱呢?”

尽管考虑得十分细致缜密,但事实上这并不能算作一项计划,而顶多是个玩笑式的梦想,到头来还是没有任何可以摆脱日益频繁的剧烈头痛的出路可言。尼采在一封给他妹妹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结婚,虽然值得向往,然而于我而言却是最不可能的事。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

1879年9月11日,尼采从圣莫里茨城写信给他的朋友彼得·加斯特:“我快三十六岁了。1500年来,人们一直都在谈论这一‘生命的黄金时刻’。但丁对此有他自己的幻想,并在诗作开篇谈及了他的想法。而如今,我在生命的黄金时刻却为一种随时都会将我吞噬的死亡所包围,我的病痛使我想到了抽搐后的暴死(尽管我更喜欢那种缓慢而清醒的——即便会更痛苦——还能与朋友有所交流的死亡过程)。就这点而言,我感觉自己已经衰老不堪。当然,终生事业已完成也是我有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一年,尼采放弃了他在巴塞尔大学



的教师职务，得到了一笔每年为 5000 法郎的退休金。他来到上恩加丁，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似乎有所好转：“平生第一次有种轻松的感觉……一切都很好。我想长期留在这里。”他这样写道。然而，相隔两周后：“我病重卧床已有四天，每天都是一段痛苦的折磨。但是尽管如此，这儿还是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好。我似乎已经寻觅了很久，最终还是找到了。我不再指望病情的好转，除非身体彻底痊愈。但是，要做到‘能够忍受病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尼采在他生命中的第四个十年里，又写下了《太有人性的人》、《曙光》、《快乐的科学》、《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及《善恶之彼岸》等几部著作。四十四岁那年，他在都灵遭遇精神崩溃，此后一直生活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直到 1900 年 8 月 25 日去世。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我一天天付尽了艰辛  
才挣足自己的面包，怎么可  
能负担起一个家庭的重  
担。”

# 他把亲生儿送进了孤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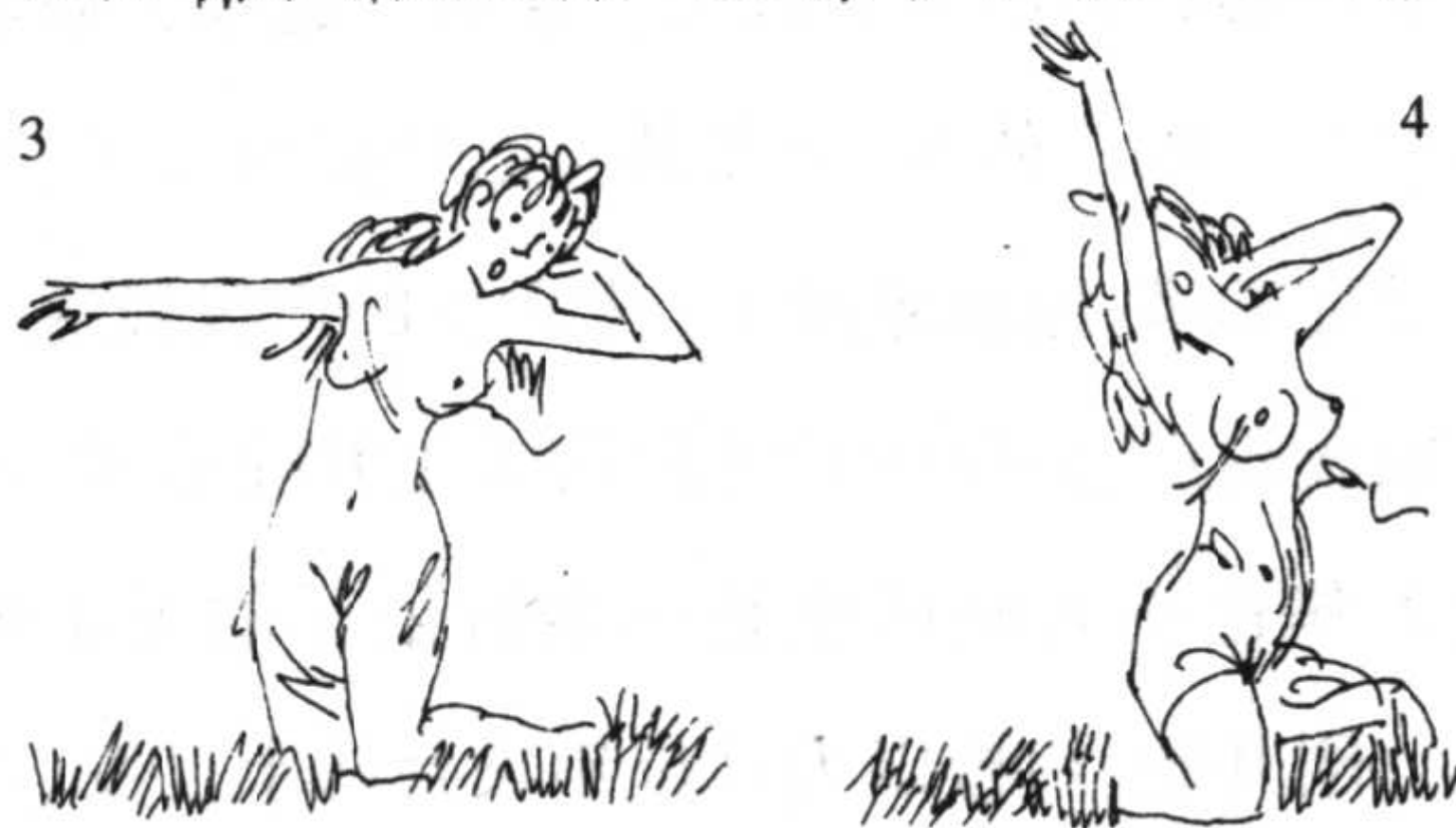
——卢梭

让·雅克·卢梭：18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思想和著作对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著作有《民约论》、小说《爱弥儿》和自传《忏悔录》等。

年届而立还一事无成且前景不佳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位日后成名、成绩斐然的法国作家、“文化悲观者”让·雅克·卢梭。从十六岁起，卢梭就开始尝试自谋生路。他做过铜版雕刻匠、音乐教师、编曲者，也做过仆人和家庭教师。他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钟表匠，甚至未等学徒期满就打了退堂鼓。他从作曲开始，最后以作家之名誉满天下。

卢梭于1712年6月28日出生在日内瓦，父亲是一名钟表匠。他后来曾这样描述道，自己

出生时“奄奄一息，体弱多病”，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一颗顽疾的种子”。这个顽疾就是日后纠缠了卢梭一生、使之痛苦不堪的膀胱病。“我的出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不幸”，这句话既是卢梭对其自身不幸的哀叹，同时也是对他死于分娩的母亲的凭吊。十岁之前，卢梭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当后者由于一场官司而不得不离开日内瓦时，他将儿子送到了他的叔叔家。卢梭的叔叔先将小卢梭托付给一名教士，接着又送他去做学徒。至于以后的事，上文其实已经提到过了；未等学徒期满，他就跑掉了。十六岁的卢梭被送入一家收容所，那里住着年轻的天主教皈依者，负责人华伦夫人同样也是一名皈依了的天主教徒。刚开始，卢梭以为这位年长自己十三岁、总是给人一种“乐善好施”印象的夫人是一名终日只知祷告的老宗教迷。但事实上，华伦夫人当时只有二十九岁，有着——他这样向人描述道——“一张优雅妩媚的脸蛋，一双美丽温顺的蓝眼睛，肤若凝脂，胸脯饱满”；她“将她那暗金色的头发松松垮垮地挽成一束，样式十分迷



人”。被卢梭称为“妈妈”的华伦夫人在几年后成了他的情人。她把卢梭送到都灵一个天主教会为宗教皈依者开办的招待所，在那儿卢梭成了一名天主教徒。之后，他又回到了瑞士华伦夫人身边。在他不安定的流浪生活中，卢梭多次重返华伦夫人的怀抱。直到后者有了新情人，他才最终离开了他的“妈妈”。

三十岁那年，卢梭迁居巴黎。

三十岁的他怀揣着——卢梭后来在他著名的《忏悔录》中这样回忆道——“15个金路易”来到法国的首都，喜剧剧本《那喀索斯》和一个设想用数字代替音符的记谱法是他“惟一的救济来源”。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维持他在巴黎的最低生活标准，几个金路易也足够他在索邦神学院（巴黎的一所高等学府——译者注）附近租到一间极为简陋的住房——“一条丑陋的街道，一家丑陋的旅店，一个丑陋的房间”。一位比较了解世情的熟人告诉他，“在巴黎，只有通过女人才能成就事业”。而卢梭在寄走了几封谋求家庭教师之职的推荐信后，确实也找到了一个资助

他的女人——总税务官德比奈的妻子。按照卢梭的描述,她是“巴黎最美丽的女子之一,居住的房子华丽无比。她希望所有有声望的人——伟人、作家、美女——都能出现在她的府邸。围绕在她身边的全是公爵、大使以及其他的达官显贵”。德比奈夫人第一次接待卢梭这个“乡巴佬”的地方是自家的盥洗室:“她裸露着双臂,头发蓬松,衣衫不整。于我而言,这样的接待方式相当新鲜。我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失去了控制——一句话:我爱上了她。”

在德比奈夫妇的帮助下,卢梭得到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秘书的职位。他十分喜欢这个工作。然而一年后,由于与大使的一点争执,他又回到了巴黎。在巴黎,卢梭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生活伴侣的特蕾泽·莱瓦索。莱瓦索当时只有二十二岁,比卢梭小了整整10岁,在一所寄宿学校做帮工(之后,卢梭便定期在这个学校用午餐)。他称她是一个“富有情感,却丝毫不懂卖弄风情的纯朴女孩”,“她很害羞,我也一样。这种共同的特质似乎会阻碍我们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我

们还是迅速地结合了”。如果不是莱瓦索顾虑重重,犹豫着不愿表白,他们的关系也许会发展得更加迅速:

“我们终于彼此袒露了心迹。她哭着承认了在她几乎还是一个孩子时候的惟一一次失身。这种结果是缘于她的无知和一个诱奸者的狡猾。‘处女!’我喊道,‘谁会愿意在巴黎寻求他的处女情结!谁会向一名二十岁的少女索取她的童贞!啊,我的特蕾泽,我太幸运了,我寻求的是你的庄重和健康,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但是,莱瓦索没有受过教育,举止相当粗俗,这是卢梭从一开始就比较介意的一件事。他承认:“开始我也有过改造她的念头,为此我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她的思想停留在最初的无知状态,任何一种形式的教养于她都是多余的。我并不羞于承认,虽然她的书写还算过得去,但是她从不懂得阅读。”尽管卢梭曾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教她,但是特蕾泽最终还是没能学会从对面房子围墙边的日晷上读出时间。是的,“她既不会数钱,也看不懂物品的价格。她说



的话往往与她想说的正好背道而驰”。

然而,卢梭钟情于这个“头脑简单、愚笨无知(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的人”。回首往事时,他对她大加赞赏,因为她“曾在困境中想出过绝妙的主意”。“无论在瑞士、英国,还是在法国,每当我遭遇不幸时,她经常能发现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东西。她会给我最好的建议,会帮助我逃脱我盲目陷入的险境……”

发现特蕾泽善于给人出谋划策这个能力还是后来的事。三十岁的卢梭刚开始的最爱是他与特蕾泽的二人世界:“这种关系让我觉得其他任何一种消遣都是多余且毫无价值的。拜访特蕾泽是现在惟一能让我出门的理由。她的公寓都快变成我的了。这种退隐生活对工作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完成了一部歌剧,从歌词到音乐。”

这部不太成功的歌剧并不是这种甜蜜关系的惟一成果。不久,另一项成果便紧随其来——卢梭在舍农索城堡写了一段时间戏剧后,被养得“肚满肠肥如修道士一般”回到巴黎时,他才

得知：“当我在舍农索长胖的时候，我可怜的特蕾泽在巴黎以另一种方式变得臃肿不堪。当我回到巴黎时，我发现自己的杰作竟然在以出乎我所想像的速度成长着。”

他的杰作就是特蕾泽怀孕了。但卢梭并不想跟她结婚。这个问题在他们“结合”之初就已经得到过挑明：“我事先向她声明过，我永远不会离开她，但也不会娶她。”尽管如此，特蕾泽怀孕一事还是差点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在旁人的指点下，卢梭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他自愿“遵从国家现有的道德规范，关心孤儿院的居民”，将孩子偷偷送进孤儿院。“这就是我所寻求的出路，我毫不犹豫就做出了决定，然后使出浑身解数劝说特蕾泽采用这个惟一能挽救她名誉的办法。特蕾泽的母亲担心孩子降临给她增添麻烦，她和我一同使特蕾泽战胜了自己”。

孩子在助产士的帮助下顺利出生，同时“通过助产士以一种当时流行的方式把孩子交到了孤儿院的办公室”。这一切显得简单而又方便，

以至于卢梭对他的第二个孩子也采取了同样的解决方式：“第二年还是同一种弊病，同一种解决方法。”对此，他还补充道：“孩子的母亲叹着气听从了我的安排。”接着，第三个孩子也进了孤儿院。在此期间，三十八岁的卢梭参加了第戎科学院的征稿竞赛，以其名为《论科学与艺术》的论文获得了比赛冠军。卢梭由此而开始成名，他的作品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延续至今的热烈讨论。第戎科学院悬赏征求答案的问题是，随着文化的进步，人类是否会变得更好。对此，卢梭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在答卷中为人类虚构了一种快乐自然的原始状态，但是知识与财产私有化使得人类最终从这种原始状态走向灭亡。

此后，尽管身患日益严重的被追踪幻想症，生活得不到安宁，还时时遭到真正的追踪，卢梭还是笔耕不辍地写就了大量著作。在长篇巨著《爱弥儿》中，他提出了一种自然教育原则，其原文如下：“没有尽其父亲之责的人，也无权成为他人之父。贫穷、工作以及任何人情世故都不是免除其抚育幼子之责的理由。”

其时,他又将那“愚笨之人”的第四、第五个孩子陆续送进了孤儿院。在他五十八岁那年,在他与特蕾泽共同生活了 23 年后,他终于跟她结了婚。10 年后(1778 年 7 月 2 日),让·雅克·卢梭去世。此后,她的妻子又活了 20 多年。

卢梭晚年也曾对自己的弃婴行为进行过反思。在一封写给弗朗克伊夫人的信中,他是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我一天天付尽了艰辛才挣足自己的面包,怎么可能再负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如果孩子的喧闹和种种家庭琐事令我心神不宁,无法从事赖以谋生的工作,那我又该如何履行作家应有的使命?为饥饿所迫而写的文字,注定收益不大。那样,我会不得不求助于别人的庇护,求助于阴谋诡计和伪装掩饰;我不得不在正常的工作之外谋求一份兼职。总之,我将不可避免地干一些我所厌恶的可耻行径。我,我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母亲将要依靠不幸之人的鲜血活命!不,夫人,对于他们来说,成为孤儿总比有个不称职的父亲好……”这位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锋接着又补充道:“夫人,本来地球

是完全可以养活全体人类的，而正是您这等富翁窃取了我们这等人孩子挣来的面包钱。”

年近五十的卢梭重病缠身，似乎对自己早年的弃婴行为有了一丝悔意。他在信中对弗朗克伊夫人说，自己感到良心不安：“当初送孩子进孤儿院时，竟然没考虑过有一天要去认回他们”，也没有记下任何一个孩子的出生日期。他承认：“多年以来，由于这些疏忽而引起的内疚常常使我心神不宁。我和孩子的母亲至死也没法弥补这个令我们深感后悔的过失。”

卢梭死后曾一度风行过这样一种说法，即卢梭编造出那五个孩子的故事是为了证明他的男性性征，因为下腹患病，他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是卢梭的尸体解剖结果显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在研究探寻其膀胱病的病因病情过程当中，人们并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与常人异的地方。

此外，像而立之年的卢梭那样把亲生孩子送进孤儿院的做法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卢梭的传记作家乔治·霍尔姆斯滕曾指出，根据某些

流传至今的资料可以得知，从 1740 到 1760 年期间，仅巴黎一个地方的孤儿院就收养了将近 10 万个被弃婴儿。



**沃尔夫冈·莫扎特**

**Wolfgang Mozart**

**1756—1791**

“假如没有您的帮助，  
您的朋友的荣誉、安宁以及  
生活将全部毁于一旦。”

## 花钱如流水的神童

### ——莫扎特

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欧洲古典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等。

与三十岁尚未有所成就、而后才以轰动性著作闻名于世的让·雅克·卢梭相比，有“神童”之称的莫扎特三十岁时却已名声在外，很早就登上了创作事业的巅峰。而传统观点认为，这两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与卢梭一样，莫扎特在他三十几岁时也还是个一贫如洗的穷光蛋。莫扎特于1756年1月27日出生在萨尔茨堡。作为一名平民天才，他在王侯专制时期受尽了统治者无情的剥削。传说莫扎特经常遭到一些贪婪的邦君、贵族和委托人的利用，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报酬往往少得可怜，加上妻子的挥霍成性使他不得不频频举债；而债主的冷酷无



情最终令他债台高筑,彻底陷入了困境。

1791年12月5日,莫扎特在维也纳去世,享年未满三十六岁。他遗留下的债务总额高达今天的7.5万马克,以至于妻子康斯坦策放弃了丈夫全部遗产的继承权。也就是说,她同时还放弃了对莫扎特作品(当时还属于莫扎特自己的作品)的继承。康斯坦策根本无力做到合乎身份地安葬她的丈夫,她只能在一块穷人墓地为他找到一席安息之地。

某些传记作家将莫扎特陷入了如此这般无以复加的经济困境而不得善终的很大一部分责任推到了他的妻子身上。他们认为,康斯坦策不通持家之道,只懂如何挥霍。可是一个女人的挥霍能造成7.5万马克的债务吗?此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据说在莫扎特去世之后,不论是作为寡妇的康斯坦策,还是步入了第二次婚姻的她,都极其善于理财持家。

这只是众多无稽之谈当中的一种。汉堡的音乐学家乌韦·克雷默为此还在几年前根据一部分流传下来的信件文献对莫扎特的经济状况

进行了一番核实。考察结果显示,年近而立、身兼数职(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和音乐教师)的莫扎特收入不是不高,而是非常之丰厚。从萨尔茨堡迁居到被誉为“钢琴之乡”的维也纳之后,他甚至有过迅速跻身富人行列的可能。他所教授的钢琴课每小时学费高达两个古尔登(当时的货币——译者注),是他德高望重的音乐教育家父亲所得报酬的十倍。

莫扎特平均每年举办六次音乐演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类型的演出),每场演出据他自己说能给他带来“至少 1000 古尔登”的收益。根据克雷默的计算,“莫扎特每年的年收入可达 1 万古尔登”。相比而言,当时一所维也纳普通医院的高级主任和主治外科医生的年薪也就区区 1200 古尔登。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1 古尔登相当于 25 马克),没有固定工作的自由艺术家莫扎特一年的收入总额为 25 万马克,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的平均水平。尽管如此,刚开始时莫扎特还是频频向父亲以及共济会会员米夏埃尔·普赫贝格——莫扎特本人是共济会的成

员——请求经济援助。然而，即便考虑到莫扎特在维也纳的奢侈生活，这些收入也够令人叹为观止的了。一到维也纳，他便租下一套当地最贵最漂亮的住房（但是没过多久，他就用这套房子换了一套相对比较便宜的）。他为自己雇了一名专用理发师，一名厨娘和一个女仆，还养了一批用作坐骑的马；他着装昂贵，饮食开销巨大。仅此几项，凭他的高收入就难以为继了。他经常有囊中羞涩、手头拮据的时候。他的几封看似十万火急求助信应是很好的证明。而实际情况大概就是如此。

“我最亲爱的朋友！凭着拥有您对我的真诚友谊与手足之情，在此不揣冒昧向您求助”。三十二岁的莫扎特在给共济会会员普赫贝格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还欠您 8 个杜卡特（14 到 19 世纪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只是本人目前处境不妙，尚无力归还。敢问：您是否愿意于下周之前（届时，我在俱乐部的音乐会将如期举行）再接济我 100 古尔登——待下周我拿到我的收入后，必定将这 136 个古尔登连同最热烈的感激

之情一并奉还……”

几天后,1788年6月17日,大概在得到了上述借款之后,莫扎特再次致函普赫贝格:“我坚信您是我真正的朋友,也相信在您眼中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为此我可以向您尽敞心扉……假如您的友情还在,爱我之心未变,愿意在一至两年内带息资助我一或两千古尔登,我将感恩不尽!”

而这一请求的理由只是:“如果每天都得眼巴巴地等待着进帐的话,人就无法正常生活。如果没有一定数额或最低限度的储蓄,生活就无法进入正常状态……”显然,莫扎特此时的财政状况一片混乱。他迫切地想弄到一笔钱,而且最好是马上就能得到。接着,他又继续写道:“假如您无法很快筹到这个数目,那就请您最迟于明日之前先借给我几百古尔登。我的房东实在过于谨慎,为避免不测,非得要我即刻付清房租。这使我手足无措,一筹莫展。”

仅仅过了10天,莫扎特又向普赫贝格写信求助:“眼下的境遇迫使我不做出借钱之

举——可是，上帝啊，我该相信谁呢？除您之外，别无他人了，我最好的朋友！——我期盼着您能伸出友谊之手，通过其他途径为我筹钱。”接下来的话语犹如万分危急时的求助呐喊：“要是您，我最珍贵的手足，弃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我将失去我惟一愿意维系的，即我的荣誉和信用……只有在我的这个愿望实现的情况下，我才得以自由呼吸，才能重返正常生活，并将长此以往。”

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不久，1788年7月初，莫扎特致函普赫贝格，随信附有两张当铺收据。显然，莫扎特又像往常一样典当了一部分贵重物品。如今他以这两张当票作为抵押，准备向他共济会的会员朋友借钱。在信中他写道：

“我的事业经过一番惨淡经营已有了一定的起色，眼下就看能否靠这两张当票借到一笔钱了。我恳请您看在我们友情的份上帮我这个忙，而且最好是尽快。我为我的纠缠不休而感到抱歉，然而您应该知道我目前的处境。唉，您要

是帮了我这个忙就好了！助我一臂之力吧，让我梦想成真！”

或许这一次普赫贝格拿出了一笔较大数额的钱，总之，莫扎特的下封求助信直到一年后才出现。但是，也不排除部分信件已经流失了。1789年7月12日，莫扎特在信中向普赫贝格抱怨道：“天哪！我的处境就是我最大的敌人也不愿看到的啊。要是您，我最好的朋友、最亲的手足，弃我而去，我就会与我那羸弱无辜的妻儿一同迷失于不幸之中。之前在您家时，我就想对您一诉衷肠，只是我没有这个勇气！……”在向朋友暗示了靠六首钢琴奏鸣曲和六首四重奏能够马上得到一笔钱后，莫扎特再次发出了求助信号：

“现在一切都看您的了。我惟一的朋友，您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再借我500古尔登？我会……每月还您10古尔登……”紧接着，他又向普赫贝格施压：“考虑一下，假如没有您的帮助，您朋友的荣誉、安宁以及生活将全部毁于一旦。”

没过几天,1789年7月17日,他又给普赫贝格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借贷一笔数额更大的款项:“也许您根本无力再资助我这样一笔钱;但是,要是您对我还怀有昔日的友谊和手足之情,就请在这一刻尽力帮助我,因为这确实是我最后的出路……”他在信的末尾写道,“在此恳求您的火速援助,数额大小悉听尊便。”

就像自己一贯所做的那样,普赫贝格再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尽管莫扎特不得不承认,借给他的钱常常无法如期归还。

他不断地发出求助信。1789年12月29日,莫扎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不必为这封信的内容而感到惊慌!借给我400古尔登,就可以帮助您的朋友摆脱最大的困境。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在规定的时间内用现金归还这笔款子,到时一并奉上的还有我浓浓的谢意……再次求您,助我脱离困境!”

莫扎特借钱的频率越来越高,几天后又借了两次,分别为100古尔登和600古尔登。“我被迫向高利贷借钱,因为我已没有真正的朋

友。”1790年5月17日,在给普赫贝格的信中他承认到。一个月后,也就是1790年6月12日,他再次致函普赫贝格:“为了弄钱,我不得不贱价出卖我的四重奏。”他心仪已久的宫廷副乐长一职最终也未能落到他的头上。

可以肯定的是,莫扎特那一封封求助信的缘起就是他的赌债。根据宫廷乐长德图什的描述,莫扎特是牌桌、尤其是台球桌旁一名狂热的赌徒(那时的台球偶尔也会用来进行赌注极高的赌博活动),他“热衷于台球,却玩得很糟糕。要是维也纳来了一位台球高手,他的兴致恐怕比来了一位音乐名人还高。他下的赌注很高,态度十分轻率,一玩就是通宵”。

不能如期偿还赌债,在当时是一种有辱名声的做法;一名负债累累的赌徒,不管是谁,都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小人。这就说明了为何莫扎特的求助信措辞一概如此急切,同时也说明了为何他会隐瞒了经济拮据的真实原因,而假口于诸如妻子的患病疗养之类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根本不可能花费掉他前前后后所有的借款。





**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

“短短几天，我的资产  
就已经翻了三番。”

## 有商业头脑的哲学家

——伏尔泰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法国启蒙运动的导师和精神领袖。既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又是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著有《查第格》、《老实人》、《哲学书简》等。

谈论金钱，尤其是在艺术家、诗人、哲学家的传记中谈论某人有无金钱，谈论可以“挣”到的金钱，在人们眼里向来是种粗俗的、不够谨慎的举动。因而，在大部分有关法国作家及哲学家伏尔泰的传记中，作者一律遮羞似地隐瞒了他那天才般肆无忌惮、不甚体面的从商经历。伏尔泰于1694年11月21日在巴黎出生，于1778年5月30日在巴黎去世，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二十五岁起以“伏尔泰”自称，三十多岁时已是一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同样的年纪，莫扎特负债累累离开了人世，而伏尔泰却成

功地利用全部财产——自己挣的加上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遗产——投机赚了大钱。

那是一次由法国财政部长为改善陷入了困境的国家财政状况而发起的奖券抽彩活动。伏尔泰和数学家拉孔达米纳在计算中彩几率时发现，抽彩活动的举办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定，如果有人买下所有的奖券，他将尽赚 100 万里维（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相当于 1 古斤金或银的价格）。伏尔泰当下便联合几位朋友买下了这一期的全部剩余奖券。开始时，国家奖券总监为奖券的一售而空感到万分高兴，但是当他发现了事情的原委之后，竟然拒绝支付这笔款项，还以诈骗罪名将伏尔泰及其伙伴告上了枢密院。尽管事情发生在一个尽人谩骂的专制主义时代，个体公民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足轻重，但是枢密院最终还是做出了有利于公民伏尔泰的判决。国库必须支付他们的中彩赢利，而其中伏尔泰一人的份额就达到了 50 万里维，相当于今天的 500 万马克。

不久，伏尔泰又成功地干了一次冒险事。洛

林公爵建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因为当时的法国人大多视投机为消遣，用股票进行投机活动。为此，根据公司的决定，所有股票只能向洛林人发行。然而，聪明的伏尔泰利用一个发音与他原名“阿鲁埃”相近的洛林地主名字“阿鲁伊”，成功地购入大量股票，并在短期内凭借这部分股票获得了巨额利润。“短短几天，我的资产就已经翻了三番”。伏尔泰兴奋不已。

此后，他继续想方设法经营着自己的财产，在各种企业、海运公司以及粮食贸易上都进行了投资。除了写作所得收入以及法国宫廷支付的年金，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他的终生养老金。也就是说，他将大笔款子投放给他的贵族朋友，然后再以利息的形式赚取养老金。因为懂得如何定期收取养老金，故而这笔生意又给伏尔泰带来了一份可观的利润。

金钱之于伏尔泰，其重要性首先在于后者因此而获得的自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经济方面的）、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伏尔泰写道：“对于一个文人，获得巴黎名流的身份及其可疑

名誉的不利一面就是，恼人之事多如牛毛。身处没有地位的等级，就不得不承受来自于上流社会的羞辱和来自于社会底层的猜忌。因而，为了防止这些可怕的附随现象殃及我的写作事业，我打算——用无赖的话讲就是——先狠狠地赚它一笔。我赚了很多钱，也得到了安宁与自由。”

写下这段话时，伏尔泰正生活在瑞士的费尔奈。他购置了大片田地，准备在那儿创建一个理想模式的国家，耕地，养蚕。此外，他还有一个钟表厂。他乐此不彼地经营着这个世界，到老兴致也不减当年。他八十三岁去世，身后给他的侄女、德尼夫人留下了一笔相当于今天 1000 万马克的可观财产。

而立之年的伏尔泰绝对想不到自己竟会那么长寿。早在他还在为自己的财富打造根基、为更多的商机集聚时间精力、不顾自己的言论有再次被投进巴士底狱（在这之前，伏尔泰已经有过两进巴士底狱的历史）的危险而为作家的不朽名誉奋斗之时，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频繁的发烧、绞痛、消化

不良以及神经痛等如影随形般折磨着他。他的口袋为此也总是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盒和药瓶。在朋友们眼中“鬼魅般丑陋干瘦”的伏尔泰认为,自己不会比他那只活了 40 年的姐姐更长寿。但是事实上他活到了八十三岁,寿长是他姐姐的两倍还多。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这种美妙的植物能使  
饿汉不饥,弱者自强,让他们  
忘却曾经遭遇的厄运……”

## 可卡因带来快感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  
精神病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  
始人。他发现梦在精神分析中的重  
要性，1895年出版《梦的解析》，精  
辟地分析了梦的机制。

从经济状况看，日后创立心理分析法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在他的而立之年还远远谈不上有所建树。但至少他的一个梦想在他整三十岁那年得到了实现，那就是：如愿娶回了订婚多年的未婚妻玛莎·伯尼斯。弗洛伊德于1856年5月6日出生在弗赖堡的梅伦。婚前不久，他刚刚在维也纳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等待病人上门。时值1886年的夏末，未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还是渺茫一片：首先是经济状况不够稳定；其次是由于他错误地认为，可以借助可卡因来消除吗啡瘾，从而引发了所谓的“人类的第三



次灾难”，三十岁的弗洛伊德备受公众的责难。事实上，弗洛伊德尝试的只是一种召魔驱鬼式的做法：吗啡瘾最后变成了可卡因瘾。结果证明，这个尝试后患无穷。

三年前，弗洛伊德借助于一系列在自己、未婚妻和患有吗啡瘾的同事身上进行的试验，初步得出了可卡因具有某种疗效的推断。他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公布了自己的发现，并且推荐人们服用可卡因来增强体质。然而，他的结论似乎下得过于轻率了。这轻率的原因还在于弗洛伊德想利用可卡因这种鲜为人知的东西尽快取得名和利。他把这一发现称为“希望的工程”，并在信中对未婚妻这样说道：

“我正在读一些有关可卡因的资料。可卡因是可卡叶中的有效成分，某些印第安部落居民习惯在物资匮乏或者疲劳的时候咀嚼这种叶子来补充精力。一个德国人曾在士兵身上试验过从中提取的药，发现它的效果的确十分神奇：它使人精力充沛，身体强健，工作效率明显有所提高。我想找到这种药并亲自……尝试一下。或



许……尝试的结果毫无价值可言,但是我得试一试。你知道,世上的事情只有尝试了才会成功。如果这一次成功了,我们的房子装修就有希望了。”

开始时,弗洛伊德贷款购买了一些可卡因用在自己身上。他服下 0.05 克后,情绪立见高涨,进入了一种“惬意”的状态,“犹如一顿丰盛的晚餐后,脑海中空空如也”。这样的结果令他大受鼓舞。他把可卡因看成了一种既能让人兴奋、又能——就像他在资料上读到的那样——让人提高工作效率的“神药”。他立即给未婚妻寄去了这种能够“强身健体”的“神药”;同时,弗洛伊德的姐妹、朋友和同事也分别收到了他的礼物。在这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一篇文章,轻率而又不加任何批判地对可卡因进行了一番赞美:“这种美妙的植物能使饿汉不饥,弱者自强,让他们忘却曾经遭遇的厄运……你会感到自制力有所增强,工作能力明显提高……毫不费力就可以完成持久紧张的脑力和体力劳动……”

他甚至感觉到了性能力的增强。一次,玛莎在信中告诉他自己没有胃口,气色不好,病态恢

恢。他回信道：“要是我来了，我的小公主，你得忍受的将是分娩时的阵痛。我会吻得你脸红耳赤，喂得你丰腴诱人。如果你淘气不听话，我就会让你看看，究竟谁更强劲有力——一个吃不下东西的温柔女孩，还是一个食用了可卡因的狂野男子。”接着，他又补充道：“上次身体不适时，我又服用了可卡因。只吃了一点点，就奇迹般地全好了。”

在学术论文中，弗洛伊德谈到了可卡因的“兴奋作用和给人与常人无异且相当持久的精神快感。你会感觉和正常人一样，根本察觉不到自己处于药物的影响下……完全没有那种伴随着酒精发作而产生的兴奋感，也没有酒精的副作用……”

但是，要想把这个当成试验的科学成果，弗洛伊德的试验依据似乎显得过于单薄了。归根到底，这不过就是一次不充分的亲身实验，实验结果也尽是一些主观感受。弗洛伊德不负责任地到处传播他的体验，并声称：“一次或多次服用可卡因后，完全不会产生进一步的服用要求，

有的也只是一种不明所以然的反感。”

或许对于弗洛伊德本人而言，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对于他的试图通过可卡因治疗其吗啡瘾的同事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后者虽然成功地摆脱了吗啡，可是对可卡因的需求却越来越大。他渐渐上了瘾，接着又转化成慢性中毒，最后得了震颤性谵妄。弗洛伊德在看到了同事的惨死之后，便告诫自己的未婚妻不要过于依赖可卡因。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是定期地给她寄去这种“神药”。侥幸的是，他和玛莎始终没有上瘾。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信任弗洛伊德的推荐而服用了可卡因，之后却再也无法摆脱这种药物。为此，三十岁的弗洛伊德被谴责为引发了“人类（继酒精和吗啡之后）的第三次灾难”。尽管这样的谴责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弗洛伊德是为了达到出名谋利的目的才轻率、不加任何批判地公布了他那令人费解而又错误百出的科研结果。弗洛伊德为此而感到了深深的自责：正是因为自己，同事才患上了可卡因瘾，从而加速了死神到来的步伐。

弗洛伊德对于可卡因的这种狂热，完全可以归因于伴随了他一生的那些忧虑不安和情节症。可卡因可以将他暂时从压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增强他的自信心。当他意识到可卡因并非像他所想的那样安全无害时，他又重新开始抽烟。他抽雪茄，而且——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供认不讳——抽得非常凶，特别是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的那10年中，那是他的家庭迅速壮大的时期。在此期间，弗洛伊德建立起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写下了大量文字，还有四个孩子先后来到了世上。

弗洛伊德三十七岁时，有个朋友预言他将会在五十一岁那年去世。因为心脏病的频繁发作以及时常心生巨大恐惧，弗洛伊德原本就坚信自己不会活得太久。他把自己的早逝归咎于吸烟——那时的他每天至少得抽20支雪茄。后来，在朋友的劝告下，他曾尝试过戒烟。然而随着戒烟的进行，他的心脏状况非但没有变好，反而每况愈下，病情愈演愈烈。对此，他是这样描述的：

“戒烟后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有过一次心脏病的突发，情形坏过以往抽烟时的任何一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心律不齐，持续不断的心肌紧张、挤压、烧灼，左臂中的血液循环滚烫灼人……情绪极其低落，似乎看到了死神的降临……”

这次戒烟前后共维持了七周。当弗洛伊德再次开始了大量吸烟之后，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比不吸烟的那段时间好了很多。只是现在他对自己究竟能否活到五十一岁这个问题有了一丝怀疑。他认为自己会在四十几岁时死于一次心力衰竭。为此，在朋友的劝告下，弗洛伊德决定再与命运拼搏一次：开始，他每周只抽一支雪茄；几周后，他连这惟一的一支也放弃了。这次戒烟他坚持了一年多。而后他又旧病复发并最终认定，要想彻底戒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实际寿命比他人预言的多了32年。八十三岁那年，一场旷日持久的口腔癌变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科西玛·瓦格纳**

**Cosima Wagner**

**1837—1930**

“等着我，我愿与你共同承受人生。这将是我最最大最神圣的幸福……”



# “我这一生是幸福的一生”

——科西玛·瓦格纳

科西玛·瓦格纳：德国著名作  
曲家瓦格纳之妻，拜罗伊特音乐节  
的艺术指导。

科西玛·瓦格纳在她三十岁的那年(那时她还是钢琴家汉斯·冯·比洛的妻子)，勇敢地迈出了对自己的人生有着重要意义的一步，那就是——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以及与他所生的两个女儿，来到了比她年长 24 岁的理查德·瓦格纳身边，并且从此与这个她深爱上了多年的男人生活在了一起。她还为这个注定要与她相知相守的男人带来两个女儿。在她正式结束了第一次婚姻并和瓦格纳结婚后，他们的儿子齐格弗里德也来到了世上。

科西玛是音乐家弗朗茨·李斯特和法国女作家玛丽·古达尔伯爵夫人的女儿，于 1857 年 12 月 25 日出生在意大利的科摩。1868 年 1 月

1日，刚刚过完三十一岁生日的科西玛开始撰写她的日记。这是一部书一般厚的日记，密密麻麻写了两千多页，花去了科西玛14年的时间。她为她的儿女所写，并寄希望于自己所做的一切能够通过这部日记得到他们的理解。

“圣诞节——我三十一岁的生日，本应是这本日记的起笔之日，在鲁采恩我没有开始写。我的孩子们，我对你们的告白，应与新年同始。”科西玛在日记的开篇这样写道，“你们应了解我生命中的每一时刻，否则便无法认清当时的我……你们应以此来帮助我履行自己的义务——是的，我的孩子——我的职责……”

几句话后，科西玛对于这一“职责”有了进一步的解释，即：全心全意为那个被她称为“惟一的朋友”、灵魂“守护神”及“拯救者”的男人及其创作效劳。“为了得到你们的理解，”她写道，“我必须承认，直到认清自己内心真正使命的那一刻，我的人生还是一场了无生趣的噩梦……内心荒芜一片……”当她醒悟到自己从未真正生活过时，她在精神上便经历了“一次重生，灵

魂得以拯救,内心的一切虚妄污浊消失殆尽,化为一腔热爱。我誓将以我的生命、我最神圣的信仰以及所能奉献的一切为代价来维护这份爱。”当她看到,理查德·瓦格纳,这位“所有高尚真实之物的昭示者”,在无朋无友、毫无乐趣的生活中陷入了孤独之渊时,她向他发出了召唤:“等着我,我愿与你共同承受人生。这将是我最最大最神圣的幸福……”

接着,三十岁的科西玛试图向她的孩子解释自己离开汉斯·冯·比洛的原因:“我们的结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她写道,“12年前对他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还有。那是一种对其命运的关注,对其智慧心力的喜爱以及对其人格的真正尊重……”

尽管有着充分的理解和认可,然而在某一方面科西玛却无法认同他的第一任丈夫,那就是艺术家的创造力,那种她的作曲家兼钢琴技师父亲弗朗茨·李斯特令她敬重的创造力。汉斯·冯·比洛是一个富有摹仿力的人,他不是一个创新者,也不像李斯特那样极具天赋。因此,

在她眼里,他永远无法与她的父亲相提并论。

而只比李斯特小了一岁半的瓦格纳,才是科西玛心目中能与其父亲相媲美的人。他富有创造力,甚至比李斯特更胜一筹。她将她的妻子身份和对他及他的创作事业的效劳看成了自己的使命。“即使命运没有把你们的父亲带到我的身边,”她在给老大、老二两个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也不会失去我。因为我的使命决定了,我是为他而生,并将为他而死。”

瓦格纳简直就是她的上帝:“在深切认识到了他的伟大之后,他对我的好会经常令我感动得想在他面前痛哭流涕。”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但如果据此而认定科西玛是个胆小怯懦、需要帮助之人的话,那就错了。相反,她是一个自信且意志坚强的人,否则三十岁的她也绝不敢在那个年代做出那种闻所未闻的举动来。此外,她还很聪明,有着极好的教养。她在巴黎由她那极具解放思想的母亲抚养长大,自小就参加过各种沙龙聚会并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戏剧、文学、音乐的知识,了解了一些有关妇女解放的情

况以及当时的一些社会政治需求。所以,由此看来,她绝无可能听命于一个在她看来没有足够创造力的男人。她甚至连极富创造性的瓦格纳也没有盲目屈从;相反,她对他施加了影响,处处维护着他的自尊,在境遇不佳的几年里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支持。尽管日记是写给儿女们的,但是内容的重心还是落在了她的丈夫瓦格纳身上。所以一点都不奇怪,何以日记在坚持了14年后,随着瓦格纳的去世也画上了句号。科西玛比理查德·瓦格纳多活了47年。然而即使在这47年当中,科西玛全部生活的核心也还是他、他的作品以及拜罗伊特音乐工程的实施。她经常满怀感激地沉浸在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之中——那是瓦格纳、这位天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带给她的充满了幸福的一生。



**阿图尔·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他恋爱了,并且还似乎  
带了几分激情。

# “我怕受到攻击”

——叔本华

阿图尔·叔本华：德国哲学家，  
唯意志论的创始人，被称为悲观主义  
哲学家，重要著作为《意志和表  
象的世界》。

就像科西玛·瓦格纳渴望爱情那样，几乎所有年届而立的人都视爱情为生活的重要部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连以对女人的敌对态度著称的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1788年出生于但泽）在他三十岁时也曾坠入过爱河。事情发生在去意大利的旅行途中。在完成了呕心之作《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并委托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将之付印后，叔本华准备以休养之名前往意大利的米兰、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和帕埃斯图姆等几个城市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旅行。为了筹到足够的费用，他要求他的出版商马上支付该书的全部稿酬。但布罗克豪斯拒绝了这

个要求。当他由于这一“耽误”别人既定计划的举动而遭到粗暴的指责时，他声称再也不会接受叔本华的任何信函并从此终止与他的书信往来。他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

“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清楚，不需要您所采用的那种提醒方式。您的粗暴无礼只能导致我们之间的对立。”接着，这位出版商在盛怒之下又对他的作家诅咒道：“希望我的担忧——阁下的作品付印之后只是废纸一堆——不至于成为事实。”

然而，出版商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后的销售情况很不理想，在开头的一年半中仅卖掉了 100 册，余下的大部分最后都成了废纸。

但是，此时正在意大利旅行的叔本华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失败。就像上文说到的那样，他恋爱了，并且还似乎带了几分激情。他从威尼斯写信给他的妹妹阿德勒，向她通报了自己的恋情。她十分了解叔本华的为人，由于他经常口无遮拦，已经惹恼了不少人。为此，她在回信中不无



讥讽地写道：“我很同情你在信中提到的那位姑娘。上帝保佑，希望你没有欺骗过她。因为你凡事都求直面以对，为何偏偏对这可怜柔弱的东西虚情假意？”接着便是措辞严厉的指责：“你对你妻子的要求能有多少！我看无非就是众人的那一套。”阿德勒因为自己所爱的男人娶了别的女人为妻，所以一直没有结婚，过着单身生活。

那位被三十岁的叔本华如此爱恋的女子究竟为何许人氏，至今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她叫“特蕾莎”，与桂茨欧里公爵夫人同名。这位公爵夫人曾于1819年3月，也就是叔本华第二次前往威尼斯的前一个月在威尼斯认识了拜伦公爵。有可能她就是叔本华疯狂爱恋的对象。这一点可以从后来叔本华对罗伯特·冯·霍恩施泰因男爵有关自己威尼斯之行的叙述中找到佐证：“歌德为我写了一封给拜伦的推荐信。在威尼斯时，我原本打算携信前去拜访他，然而有一天的经历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天，我正和我的情人在海滩上散步。突然，我的甜心惊恐万分地大叫起来：‘看，那个英国诗人！’这时，只见拜

伦骑着马从我身边疾驰而过。这一情景是如此之险,以至于我的这位女士一整天都无法淡忘。于是,我收起歌德的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我怕受到攻击……”

叔本华悲观多疑的天性在这件事上袒露无遗。他一直生活在受骗失窃的恐惧之中,就连晚上睡觉也总是配剑带枪(上了膛的),全副武装。而他最怕的是来自于传染病的威胁。因此,为了避免在客栈中与别人共用酒杯,旅行途中他总是随身带着皮制酒杯。因为害怕染上霍乱,他曾经逃难般地离开了那不勒斯。此外,他还害怕——就像很多同时代人一样——被人活埋。所以,他曾嘱咐亲友,在他死后尸体不要马上入殓下葬。

这位如此胆小怕事的哲学家经常会一怒之下大发雷霆,偶尔还会对女人动粗。对此,下面将要提到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是叔本华刚到柏林的时候。三十三岁的他在柏林大学教哲学,住在尼德拉克街2号一个带有家具的公寓内。公寓有一个前厅,可以由另外一名房

客当作过道使用。有一天晚上,前厅里来了三个女人,其中一位是女裁缝马奎特夫人,她是叔本华的邻居,也是叔本华房东的一个亲戚。当叔本华要求这三位离开前厅时,她们拒绝了。叔本华没有丝毫犹豫,当下就强行将她们赶出了公寓。有可能在此过程中,叔本华曾相当粗暴地用手抓过马奎特夫人。总之,她让医生出具了有关身体伤害事实的证明,将叔本华告上了法庭。

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之后,叔本华被判向受害者(马奎特夫人毕竟有着两个证人为其作证)支付高达3000塔勒(18世纪通用的德国货币)的疗养费和赡养费以及每年60塔勒的终生养老金。“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斥责道,“五年前我把那人扔出房门,却没有让她受到任何看得见又有据可查的伤害”。他担心那个女人“也许会聪明到不愿停止可怜的颤抖”,从而使得他“极有可能得赡养她直至死亡”。事实证明,叔本华的担心不无道理:马奎特夫人去世时,叔本华已经年近六旬。在支付了长达20年之久的赡养费后,他终于等到了“人死债清”的一天。



**弗朗茨·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我能很好地生活，但  
却没有这样活着。”

# “我能很好地生活,但却没有这样活着”

——卡夫卡

弗朗茨·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他的作品象征着 20 世纪的忧虑和异化。成名作《判决》和《变形记》，作品有《审判》、《城堡》和《美国》等。

距叔本华威尼斯之恋的一个世纪后，同样时年三十的卡夫卡也在考虑是否需要结婚这个问题。1883 年 7 月 3 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出生，父亲是一名商人。他最初的专业是日耳曼语言文学，两个学期后改学法律，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了五年。二十九岁的卡夫卡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书《观察集》。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家和父母住在一起。1913 年 7 月 3 日，他三十岁生日这天，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通过结婚拓展生存根基，提高生活质

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卡夫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最后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我是否结婚的理由如下:

1. 我不是不会生活,而是无力独自承受生活。可我又不懂如何与人共同生活。但是,个人生活的冲击、自身的要求、岁月年龄的攻击、若即若离的写作兴致、失眠,还有那近似的精神错乱——所有这一切我都无法独自承受。也许我该补充说,与女人的结合将会令我的存在具有更强的抵抗力和承受力。

2. 所有的事都值得我去深思:滑稽小报上的每个笑话,对福楼拜和格里尔帕策的纪念,父母卧室床上睡衣的样子,马克斯的婚姻。就连姐姐昨天那句警句式的话也让我沉思良久。

她说:“(我们熟人中)所有结过婚的人都很快乐,对此我感到无法理解。”我又开始恐惧起来。

3. 我必须保持单身。至今为止,单身是我惟一的成就。

4. 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交谈(即便



是有关文学的谈论)和做客使我感到无聊,亲属们的喜怒哀乐更是令我厌烦不堪。交谈使我的全部思考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真实性。

5. 我害怕与人结合,恐惧与人同流。否则,我的单身生活就会一去不复返。

6. 姊妹们眼中的我,尤其是从前的我完全不同于他人眼中的我;或无所畏惧、丑态百出,或强大无比、出人意表、时而又慷慨激昂,就如写作时的我。如果能够借助妻子的力量在所有人的面前保持住这样一个我,那该多好啊!但是如此一来,我的写作岂不要受到影响?不行,就这一点绝对不行!

作为单身,我或许会一时高兴,真的把工作辞掉。然而一旦结婚,就绝对没有这个可能了。”

以上是卡夫卡有关是否要结婚的全部考虑。第二年,他和贾莉赛·鲍尔小姐订了婚,但不久又解除了婚约。卡夫卡最终没有结婚。三十岁的他是否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十年了?“我能很好地生活,但我没有这样活着”。年近四十的他在给朋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



这样写道。卡夫卡原本非常渴望一种平静普通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屈从于内心的这种渴念,而是痴心不改地为文学事业贡献了一生。他把生命第四个十年中的每一天都用在了文学创作上。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白天在保险公司上班,晚上埋头写作,创作出了大部分短篇小说以及《审判》、《城堡》和《美国》这三部伟大的长篇小说。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

“就算是我苛求，然而  
您得想到，我真的给自己定  
了一个极其不易达到的标  
准。”

## 颇有成就

###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德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二战期间流亡国外。著有《布登勃洛克一家》、《威尼斯之死》和《魔山》等。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有光华围绕，幸福无与伦比。我结婚了，有一个公主般年轻貌美的妻子，假如你愿意相信的话。她的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她本人则已通过大学升学考试，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此外，我还有一双健康活泼、含苞待放的儿女……”以上文字写于1907年，撰写人托马斯·曼，时年三十二岁。

托马斯·曼于两年前娶了慕尼黑大学数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的女儿卡蒂亚·普林斯海姆为妻。普林斯海姆一家十分富有，他们在慕尼黑阿茨斯街12号的产业——一幢金碧辉

煌的公馆——是当时慕尼黑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之一。

然而到那时为止,托马斯·曼总共才“制造”出了一本书——《布登勃洛克一家》,而且这本书也并没有使他一举成名。直至出版商萨穆埃尔·菲舍尔继 1901 年两卷本的版本之后又推出了一个标价为六马克的廉价版时,托马斯·曼的成功才姗姗而来。

三十岁时的托马斯·曼已具有相当不错的经济实力。有妻有儿的生活也的确令他倍感幸福。当然,日益增长的名声也是他踌躇满志的一个原因。但是对于托马斯·曼来说,仅凭这一切还谈不上有何四平八稳的幸福感觉,因为他开始怀疑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他原本打算继《布登勃洛克一家》之后再写一部至少同样出色、同样富有艺术价值的长篇小说,但是他失败了。五年后,三十五岁的他向一位朋友承认道:“就算是我苛求,然而你得想到,我真的给自己定了一个极其不易达到的标准。这个标准估计有一天会妨碍到我的写作事业。”——他的标准就是伟大

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魔山》是托马斯·曼的第二部鸿篇大作，在《布登勃洛克一家》出版二十四年之后才最终得以问世。其间，托马斯·曼还陆续发表了好几个中篇及一个篇幅较小的长篇《王爷殿下》。

托马斯·曼曾被邀请参加由慕尼黑、柯尼希施泰因、哥廷根、柏林、巴塞尔、汉堡和吕贝克等几个城市的文学社团举办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朗诵会。会后，他这样写道：“这种交际活动使我感到很愉快。”然而，某些颇有声望的同行和评论家并没有把他当作家看待。勒内·里尔克虽然对《布登勃洛克一家》赞赏有加，但是却把中篇《威尼斯之死》（1912年）的第二部分比作了“倒翻后四溢横流的墨水”。里卡达·胡赫曾经抱怨道：“如今所有的人都在阅读托马斯·曼的作品，就好像他是在世最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家……我觉得，他那些精心炮制的东西实际上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史蒂芬·茨威格指责托马斯·曼的作品中的“泛市民性”，认为这种“泛市民性”“时至今日（1912年）已经威胁到了德国艺术的健康

发展”，后者由此而面临无限“膨胀的危险”。而阿尔弗雷德·克尔最终将他归入了“中等的长篇小说玩家”之流。托马斯·曼为此深受打击：“我必须承认，这种做法让我难受了好几天。”此外，年轻一代的作家和评论家面对托马斯·曼的叙述手法也是全然束手无策。这当中首先就有他那颇具创造性和政治批判力、名望在他之上的哥哥海因里希·曼。他哥哥曾语带嘲讽地划清了自己和弟弟的创作界限：“在做了两卷本长的汉萨同盟商人后，我们最终成了两个风格迥异的艺术家的。”

尽管如此，随着《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持续热卖以及由此产生的良好经济效益，三十多岁的托马斯·曼的生活总的说来还是相当如意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多，继爱丽卡、克劳斯之后，他们在此期间又有了戈洛和莫尼卡（当另外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米尔克出世时，托马斯·曼已年入五旬）。托马斯·曼在他年近四十岁时为自己创下了两处产业，一处是位于疗养地特尔茨的一幢乡村别墅，另一处则是慕尼黑波辛格街1号

的一幢大别墅。多年后，当托马斯·曼的妻子卡蒂亚回忆起当年在建房过程中所“克服”的种种困难时，她这样说道：

“我丈夫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向任何一位出版商要求过预支稿费。他说，那样对他来说是一种压力，他不愿这么干。然而，由于特尔茨乡村别墅一事，他几经犹豫之后还是找到了菲舍尔，请求他预支一部分稿酬。你知道，我丈夫最后说道，他得向菲舍尔拿一笔预支款。接着，他提笔给菲舍尔写了一封详尽的长信，大意是：我们所需的费用远远超过了预算，我们眼下的经济状况的确相当糟糕。但是《王爷殿下》不久将会出版，而且菲舍尔出版社也正在和国外的出版社进行相关洽谈，看来这回的收益肯定又会相当可观。总之，如果菲舍尔能预支他 3000 马克的稿酬，他将感到非常高兴。菲舍尔立即给了肯定的答复，并写道：您显然是笔误了，您需要的应该是 3 万马克。因为他无法想像，一位名声如此斐然的作家竟然会为了 3000 马克而写下这么一封又是释由又是道歉的长信……”



**卡蒂亚·曼**

**Katia Mann**

**1883—1980**

“又有了吗，博士夫人？  
他，我可没法养活！”



“他，我可没法养活！”

——卡蒂亚·曼

卡蒂亚·曼：德国作家托马斯·

曼之妻。

1883 年出生在慕尼黑的卡蒂亚曾经有过非常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二十岁那年，比她年长八岁的托马斯·曼向她求婚时，她最初的回答是：“我们彼此还不够了解。”多年后，当年事已高的卡蒂亚回忆起往事时，她这样说：“那年我二十岁，感到生活十分美妙有趣，我爱我的学业、我的弟兄、网球俱乐部以及所有的一切；我过得心满意足，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么快就放弃这一切。”

十年后，对于三十岁的卡蒂亚来说，一切都变了：“……婚后不久，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我的学业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她曾经学习过自然科学：“跟伦琴学实验物理，跟我父亲学数学、微积

分、积分学、微分学以及函数理论。”当她八十七岁时,对自己当初放弃学业,她说道:“我从不认为在这些方面我有什么特别的天赋。”

三十岁那年卡蒂亚·曼病了,这是一场后果不小的病。然而,这个后果不是对她的家庭生活而言的,而是指对德国文学史的影响。她得了——卡蒂亚在她后来的《无字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轻微的肺病,一场久治不愈、完全彻底的肺结核。我不得不多次上山疗养。”1912年6月至9月,她一直住在达沃斯的疗养院,第二年有几个月在梅朗和阿罗萨,四年后再次回到了达沃斯的疗养院:

“1912年夏天,我丈夫来达沃斯看望我。那里的环境以及我所讲述的一切都深深打动了,他由此想到要写一部有关达沃斯的中篇小说。在他的计划中,这是一部基调与《威尼斯之死》完全相反的后续荒诞小说,这就是后来的长篇小说《魔山》。”

据卡蒂亚回忆,一次,她在达沃斯的医生也给她的丈夫作了全身检查,并对年近四十的他

说：“您的身体还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最好和您夫人一起在此地疗养半年。”——我丈夫把这个诊断写信告诉了我们在慕尼黑的家庭医生，后者回信道：“我十分了解您的身体状况，您是第一个不可能在达沃斯查出任何病症的人。赶紧回来吧，达沃斯没有您所寻求的东西。”

疗养间隙，卡蒂亚待在慕尼黑家中的日子也因为战乱而麻烦不断。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一家的温饱问题：“一战期间，要想养活一个有着四个未成年孩子的家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我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为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我真的骑了自行车整天在慕尼黑到处转悠，因为我们不愿与黑市贸易有任何干系。但是到了最后，这条路实在行不通了，而且不断有人上门兜售黑市商品。对于我们来说，这自然十分诱人。一次，来了一个看样子顶多只有十七岁的年轻人。他说：‘呃，如果您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我一定可以提供。’——我说：‘那好吧，我们需要一些食品。’在这之后，他时不时地给我们送过黄油、鸡蛋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那时我

正怀着我最小的女儿，第二年又有了我最小的儿子。这年轻人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又有了吗，博士夫人？他，我可没法养活！’”

除了孩子和家务，卡蒂亚·曼的另一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保证丈夫一天的生活井然有序、不受干扰。卡蒂亚的这项工作很不轻松，因为他的丈夫是一位几乎从不间断地抱怨睡眠不良，同时又十分容易分神的敏感的作家，有时他们之间还会因此而产生种种烦恼和不快。1919年3月30日，托马斯·曼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饭后与卡蒂亚发生不快。‘过错’双方都有。我因疲倦而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她打搅了我，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恼怒。不过，睡醒喝茶时，矛盾似乎已经消除了。”

两天后，他又写道：“早餐时因为黄油用量过多又与卡蒂亚发生了口角。”显然，他是希望家人能够在食物异常紧缺的时期尽量节俭，而当时的卡蒂亚已经有了9个月的身孕（儿子米尔克），分娩的日期也近在咫尺。在这种情况下，

对食品她当然有另外一种观点。事实上,在此期间,因为自身的一些需求,托马斯·曼本人也不见得有多么节约——对此,有他两天前的日记为证:“从法兰克福订购的价值为 257 马克的 300 根雪茄到了。”——他不久就为黄油一事感到了后悔:“悔不该多此一举。”面对自我(和后代),他充满歉意地补充道:“我不否认,在我疲劳过度、筋疲力尽以及因此而容易激动的时候,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人的失常总是有他体质方面的原因。知道了这一点,应该有助于我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克制。然而,这种克制本身会在关键时刻妨碍我集中精力。”

三十岁的卡蒂亚和孩子们同样深受着他那种“节制”的折磨,只是她是最得忍受的一个,特别是在下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孩子们的个性让我感到生气和伤心;克劳斯贪吃而毫无节制,禁令刚下过五分钟后又犯,被我痛揍了一顿;爱丽卡未经准许就把卡蒂亚的金笔带去学校,结果将笔遗失在那儿。真让人生气。”这是托马斯·曼 1919 年 4 月 12 日的日记片段。

那天日记的最后一笔与卡蒂亚有关：“从昨天开始，卡蒂亚睡到了二楼。希望她不久就能幸福快乐地下楼来。”事情发生在4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早上6点，我被楼上的脚步声吵醒，我知道，他们正在为卡蒂亚接生。分娩前的阵痛在午夜过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克肯贝格一大早就来了。我重新躺下，七点起床。卡蒂亚忍受着不断袭来的阵痛，但是直到八点，孩子还是没有落地。之后，阵痛似乎又减弱了……”直到中午11点——在此期间，医生也到了——才有了“缓慢的进展”。医生给产妇打了几针。接下来，“生产过程疼痛难忍，卡蒂亚痛苦不堪……”饭后，“事情终于过去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出世了……”

这是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这时，卡蒂亚·曼已经三十六岁了。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异常艰苦的年月。半个世纪后，她回忆道：“除此之外，官方还施加给我们出租房屋的义务。我们有五个孩子，所以不得不义务接收一名房客。一年后，第六个孩子出生了。于是，我找到

官方机构，对他们说：‘现在我们不能继续接收房客，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但是那名官员说：‘对此，您没有权力作出任何决定。’”而卡蒂亚，这个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纳入了丈夫那没有她的支持便无法维持的生活之中的女人，谦虚地说：“如此这般就是我的经历。”



拉埃尔·瓦恩哈根

Rahel Varnhagens

1771—1833

“我能得到有着自由之  
身的漂亮男人的喜爱吗？愿  
望和梦想能同时实现吗？”



# 幸福的光芒

——拉埃尔·瓦恩哈根

拉埃尔·瓦恩哈根：瓦恩哈根·冯·恩泽之妻，19世纪初期德国文人沙龙圈里的女主人，热心举办文艺沙龙活动。

就像记忆中的童年往往被幸福化了一样，三十岁，只有在回顾的时候人们才会赋予它另一层涵义：自信。对于很多人来说，三十岁或许是进行一次人生小结，并作出下一步规划的第一个契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三十岁的人就该比他任何时候更加操心未来。一切因人的性别、秉性而异，因时代风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前，男人三十与女人三十有着天壤之别。三十岁的女人，犹如凋败的鲜花；而对于没有丈夫的女人，则情形尤甚。

在拉埃尔·瓦恩哈根于三十岁生日前几天写给她新婚妹妹的一封信中，我们发现了一些

与上述论调相似的东西。而在年轻时就已非常独立解放的拉埃尔·瓦恩哈根的笔下看到这样的论调，的确叫人十分震惊。拉埃尔出生于1771年5月19日，父亲马库斯·勒温是一名犹太商人。她的沙龙——浪漫派和“青年德意志”派的一个聚会点——对19世纪初期柏林的文学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二十岁时，拉埃尔在耶格街54号的小阁楼举办了第一次沙龙。就在那时，她恋爱并且订了婚。在她给妹妹写上述那封信时，她刚刚解除了自己的婚约。为了排遣不快，拉埃尔去巴黎旅行了几个月，并于1801年3月14日从那儿写信给她在阿姆斯特丹的妹妹罗泽：

“……你得知道，我的妹妹，我又伤心了，伤心透了。为什么不呢！虽然有着非凡的天赋秉性，然而我，不正缺了点幸福的光芒吗？‘心中的愿望’非得‘全部腐烂殆尽’吗？我能得到有着自由之身的漂亮男人的喜爱吗？愿望和梦想能同时实现吗？我虽聪明，但却缺少幸福！我说这些又有何用！？”

三十岁的拉埃尔既惦念又担心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就是幸福的婚姻。她最终还是结了婚，丈夫是比她小了将近十四岁的外交官瓦恩哈根·冯·恩泽。对于一个四十三岁的女人来说，此时的拉埃尔健康美丽已大不如从前。尽管在聪明机智、受人敬慕的拉埃尔看来，在自己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生中（她的回忆片段以及与众多友人的往来书信已成为浪漫主义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婚姻并非人生的最高成就。然而，如果没有与瓦恩哈根的结合，她的生命历程肯定会完全不同；或许会更早地沉寂下来也未可知。在她所处的那个年代，三十岁是一个女人走向衰老的起点。而三十岁的巴尔扎克（他总是被年龄较大的女人所吸引）却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十岁的女人》中赋予了三十三岁女人一个年轻女孩所不具备的优点。这一举动在当年无疑是极具革命意义的：

“三十岁的女人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所以像侯爵夫人这样的女子与旺德奈斯这样的青年男子之间产生了深切的

好感,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没有更为自然、更为实在、更为先定的事了。确实,年轻姑娘的幻想太多,太没有经验,往往把性的问题和爱情问题搅在一起,很难叫青年男子满意;而成年妇女却懂得她所要作的全部牺牲。前者受好奇心支配,受并非爱情的诱惑所支配;后者却顺应自觉的爱情。前者对男人让步;后者对男人选择,而选择本身不就是极大的奉承吗?妇人是有经验的,她们的见识几乎总是付出昂贵的代价从不幸中获得,当她委身的时候,她给予的东西好像超出了她自身;而姑娘因无知、轻信、不懂事理,不会对比、不会品评,她总是接受爱情,体会爱情。妇人是教导人的,在我们喜欢听人指导并以服从为乐的年纪,她谆谆善诱;姑娘什么都想学,正当妇人温柔多情的时候,她们却表现幼稚无知。姑娘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次胜利,妇人却迫使你不断争夺。前者只有眼泪和欢乐,后者却是欢畅与内疚兼而有之。一个姑娘成为情妇,她准是堕落不堪了,人们会厌恶地把她抛弃。而妇人却有上千种手段既保持权力又保持尊严。前

者过分屈从,使你过得舒适、安全,然而无聊,而后者做了大量牺牲,必定会希望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前者只让一个人名誉扫地,后者却为了你的利益毁灭整个家庭……”(《巴尔扎克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沈志明译。)

在进一步列举了年轻女孩与三十岁女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后,三十岁的巴尔扎克总结道:“三十岁的女人满足一切,而姑娘什么也满足不了,否则就不成其为姑娘了。”(同上。)



克拉拉·舒曼

Clara Schumann

1819—1896

“难道你就该为了我对  
钢琴的沉迷而荒废你的才  
能吗？”

# 名人妻子

## ——克拉拉·舒曼

克拉拉·舒曼：德国著名女钢琴家兼作曲家，作曲家罗伯特·舒曼之妻。曾在法兰克福霍赫音乐学院任教，作品有钢琴协奏曲、歌曲及钢琴风格小品等，并编订出版了其夫的作品集。

十三岁就已经成功举行了音乐巡回演奏的钢琴家克拉拉·维克，也是早婚行列中的一员。十七岁时，她答应了比她年长九岁的罗伯特·舒曼的求婚：“您要的只是我的一句‘愿意’吗？如此简单的一个词是那么地重要！然而，一颗像我这样充满了难以言绘之爱的心，难道会吐不出这个词吗？我会说的，而且您会永远地听到从我内心发出的这个声音……我要让父亲明白，一颗年轻的心也是可以坚贞不渝的……”

然而，多年以来一直教她钢琴的父亲维克，

却不愿意女儿在这个时候结婚嫁人，更别说嫁的是他并不看好且赚钱不多的罗伯特·舒曼。当二十八岁的舒曼前来求亲时，父亲和求婚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们之间的不和持续了好几年，维克甚至将舒曼告上了法庭。他声称舒曼品行败坏，酗酒上瘾，继承的遗产少得可怜，根本无力养活自己未来的妻子。而舒曼则认为，老维克的话已构成了对他的污蔑诽谤，并对此提起反诉。法庭最终作出了有利于舒曼的判决。因为有关酗酒一说缺乏事实依据，维克被判入狱 12 天。罗伯特·舒曼则受法庭批准，得以与克拉拉·维克喜结良缘。这一切发生在 1840 年。1810 年 6 月 8 日出生在茨维考的罗伯特·舒曼刚好度过他三十岁的生日。他在这一年里创作了 130 首歌曲，在艺术上达到了事业发展的顶峰。在克拉拉二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他们结婚了。在婚后由双方轮流记载的婚姻日记中，他写下的第一笔是：“事业未见起色，幸福却满载而归。”

然而，他们的幸福婚姻还是出现了问题。他们只有一架钢琴，每当舒曼工作时——他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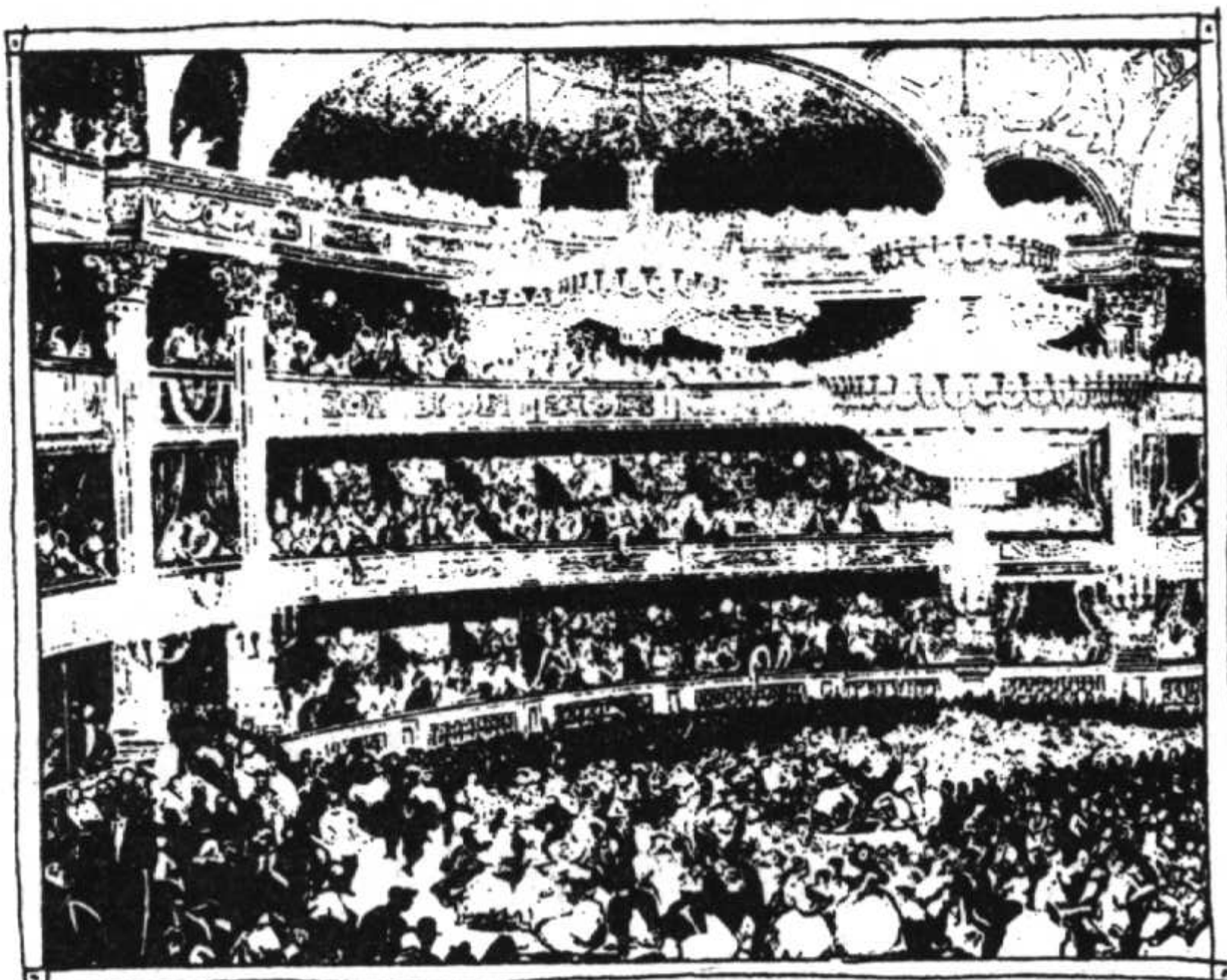
创作他的第一交响曲——她不得不忍痛割爱，作出让步。这个问题在他们的婚姻早期就已经初露端倪。1840年11月，舒曼在完成了一组用克纳的诗谱成的组歌后，在日记中写道：“克拉拉悲喜交加，因为我的歌是她用自己的缄默忍让换来的。”有时候，克拉拉连续数日都无法触摸到钢琴的琴键。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为此而担心自己的演奏技艺会因为练习过少而退步。

舒曼似乎并不认为这样会有什么不妥。他最愿意看到的是，克拉拉能够安静地待在家里，担负起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尽管他非常尊敬她，但是面对自己这位艺术家妻子，他油然而生一种生活在其阴影之下的感觉。克拉拉却不愿意放弃她的艺术家生活，她喜欢去外地巡回演出。这很正常，因为作为最知名的贝多芬及肖邦作品演奏者之一的她，钢琴演奏技艺十分精湛。关于这一点，她的丈夫也非常清楚。克拉拉公开演奏过约翰·勃拉姆斯的作品，同样她也曾当众诠释过他的作品。然而不管怎样，如此这般的情形还是令他难以释然。1842年3月，当

克拉拉外出巡演之际，他与幼女独自待在家中。这一次，他在日记中写道：

“让你离开我，是我所犯下的最蠢的一次错误。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让上帝平平安安地把你带回到我身边吧。这些天，我要守着我们的孩子。这次分别又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我们之间地位的复杂和不寻常。难道我就该弃我的天赋于不顾，来伴随伺候你举行巡演吗？难道你就该为了我对钢琴的沉迷而荒废你的才能吗？对此，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就是你带上一个陪同去巡演，我待在孩子身边同时进行我的创作。然而，世人对此会怎么说？这种想法时时折磨着我。是的，绝对有必要找到一个能使我俩的才能同时得到发挥得到发展的解决办法……”

他不喜欢陪他那名妻子举行巡回演奏，这一点毫不奇怪。而立之年的罗伯特·舒曼在公众眼里还只是个陌生的名字。人们只把他当作已成名的钢琴家克拉拉的丈夫看待，而这一点对于舒曼来说是极损脸面的。一次，他陪妻子去奥尔登堡参加一个音乐会，宫廷邀请的客人名



单上却只有克拉拉，而没有他。在维也纳和荷兰，当他被介绍给一些身居高位的达官显贵时，后者竟问道，他本人是否“也是音乐家”。

所以，他宁愿留在家中，和孩子待在一起。他认为，他那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世上的孩子是上天的恩赐，再多也不为过。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在他死后，克拉拉又为他生下一名遗腹子。克拉拉常常视孩子为沉重的负担和事业上的绊脚石，而他则认为，只有家庭才是他避风的港湾，使他免受恐惧、幻觉以及种种可怕的死亡预感的折磨。或许他把孩子当成了一种用来束缚妻子的手段，想通过孩子让妻子的心回家、回到他的身边。至少他曾这样写道：“克拉拉自己也清楚，母亲是她的主要职责。所以我想，当现实不容改变时，她的心境还是愉快的。”这是一个年近不惑且越来越远离外部世界的男人的愿望。而三十岁的克拉拉对此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四十六岁时，罗伯特·舒曼精神失常，之后便撒手人寰。



**保拉·莫德尔松-贝克尔**

**Paula Modersohn-Becker**

**1876—1907**

“生活于我就像一个松  
脆香甜的苹果，等着年轻的  
牙齿愉快地用力啃咬……”

## “是否所有才女都是如此这般？”

——莫德尔松-贝克尔

保拉·莫德尔松-贝克尔：德国表现主义女画家，曾把 19 世纪后期法国画家勃纳尔、维亚尔、高更和塞尚等人的风格介绍到德国艺术中来。

1876 年 2 月 8 日出生在德累斯顿的保拉·贝克尔，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成为女画家的想法。生活在不来梅的双亲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尽管还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夭折了）要养活，但是重担在肩的父亲还是尽自己所能给予了女儿最大限度的支持。

从 1898 年起，保拉·贝克尔开始生活在不来梅附近一个叫沃普斯韦德的村庄里。这是一个小型的艺术家居住地，她最初的老师是马肯森夫人。在那儿，她认识了画家奥托·莫德尔松，并在二十五岁时嫁给了他。

三  
十  
而  
立

保拉·莫德尔松-贝克尔的一生太过短暂，却充满了人生乐趣和希望。她感到自己有着足够的力量与勇气，去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我感到体内有着一股令我欢呼雀跃、大声高叫的年轻力量。”二十三岁生日前不久，她在日记中如此写道，“生活于我就像一个松脆香甜的苹果，等着年轻的牙齿愉快地用力啃咬……”

她经常写些类似这样的感受，也在写给父母姊妹以及丈夫的信中直言她那自觉而有意识的生活：清醒、敏感、观察入微，当地的风景、村庄、人畜、花草树木以及周围其他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都深深地印入了她的脑海。“我听到了夜莺的啼唱……每晚入夜，总有蟋蟀在啾啾鸣叫，蝙蝠在我头顶呼呼扇动翅膀。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美妙”。

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我步行穿过黑黝黝的村庄。周围一片漆黑，那黑暗好似在将我轻抚拥吻。我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这儿，我感到快乐之极。因为一切都很美妙……农舍里灯光点点，盈盈笑声扑面而来。我在内心也以响亮

的笑声回应,愉悦而充满感激。我在享受生活。”

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她又以同样的口吻谈到自己的工作:“我正尝试让自己再次投身到工作中去。人就应该为他惟一而绝无仅有的事业奉献他的全部。惟有如此,才能成就事业。我总是趁着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去户外进行写生习作……这是一种令人快乐的生活,同时又是一次无声且不简单的奋斗,人须拼上全力,只许胜不能败。假如没有了这样的拼搏,一切还会如此美妙吗?”接着,她又补充道:“这一部分主要是为母亲而写的。我想,在她的心目中,我这一生只是单纯追求快乐的自私的一生。”

事实上,她的自私的确曾遭受过母亲和姐妹的指责。一次,她在写给一个姐姐的信中这样为自己辩解道:“我看,我的目标将离你们的越来越远,而你们也将越来越无法容忍我的这些理想。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为之奋斗。我感到所有的人都对我的做法产生了恐惧,然而我必须向前,不能回头。我奋力向前,就像你们所能做到的那样,然而却是按我自己的想法,在我



自己的思想和内心中奋力向前。”

除了母亲姐妹，她的丈夫奥托·莫德尔松也曾抱怨过她的自私作风。1902年6月28日，在他们结婚一年之际，二十七岁的奥托在日记中写道：“自私自利、冷酷无情是现代社会的流行病症。尼采是其缘起发端。惟我独尊、挤兑他人，在我看来是极其野蛮粗鲁的行为。里尔克及其夫人就是这样的人……令人惋惜的是，保拉也浸染上了这些不健康的思想，一派自私作风。在她眼中不够深刻优秀的人，她皆轻蔑冷漠地置之一旁，不予理会……这种粗暴的态度和做法于我而言也是家常便饭。是否所有才女都是如此这般？不过，保拉的确非常具有艺术才能……”

婚后第二年，保拉在日记中写道：“婚后这一年来，我多次被感动得流泪哭泣，孩提时代那般硕大的泪珠常常在我欣赏音乐、看到美好事物之时夺眶而出。也许现在的我和幼年的我所经历的是一样的孤独生活。这种孤独令我时喜时悲，而且程度正在加深。人很少为外表和他人

的认可而活着。人为自己的内心而活着。我想，有这种觉悟的人应该能较早地得到解脱。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的心正渴望着一个叫作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的灵魂。我想，我们再也不会相遇。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路。而这种孤独或许就是我艺术上的良师益友……”

那她深爱着的丈夫呢？几天后，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的体会是，婚姻在锻造幸福这一方面没有过人之处。婚姻带走了一个人婚前的一切幻想。由于终其前半生都在寻找一个懂得理解的人，所以当人身处婚姻时，将会加倍地感到不被理解。面对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真理，没有了这个幻想难道不会更好？”

奥托·莫德尔松似乎一直在努力了解妻子的内心世界。他也知道，保拉与他不同，沃普斯韦德这个小村庄并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她需要获得更多富有激情的经历和体验来丰富她的绘画素材；而这一切，在她看来，只有在她二十四岁时与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一起学习绘画解剖的巴黎才有。她坚信自己有必要时不时地去趟

巴黎,还下定决心,依计行事。

三十岁生日过后不久, 保拉从沃普斯韦德致函里尔克, 告诉他自己将在最近几天前往巴黎。“我盼望着见到罗丹以及成千上万的新鲜玩意儿”。“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署名。我不是莫德尔松,也不再是保拉·贝克尔。我就是我,并且希望越来越贴近自我。这或许就是我们奋斗一生的最终目标。”——在巴黎时的日记:“我离开了奥托·莫德尔松,如今正经历着新旧生活的交替。新的生活前景如何,而我又将经历哪些变化? 一切将会见分晓。”

尽管还不是最终的决定,但是三十岁的保拉似乎已经决心放弃自己的婚姻。当莫德尔松写信劝她回家时,她回复道:“此事暂请不提。日后我会作出适当的答复。感谢你全部的爱。我的坚持并不是一种针对你的残暴与强硬,而是对我自己的严厉要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假如现在的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反省,那么半年后的我将仍然是你痛苦的源泉。我们也许会分道扬镳,请正视这样的可能性。”

将近四个月后，一直待在巴黎的保拉在信中对莫德尔松说道：“给我自由，奥托。我不喜欢你做我的丈夫。我不喜欢。放手吧，不要再为此而受煎熬。试一下，能否与过去决裂……”然而，六天后她又后悔不已：“那封冷冰冰、不近人情的信是在我心情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写成的……假如我还没有令你感到彻底失望，那就来巴黎吧，让我们为再次牵手而共同努力……”

保拉这种突如其来的反复无常，是由于她当时所面临的现实，那就是——她陷入了经济困境。在此之前，她已多次从巴黎写信给莫德尔松向他请求经济援助。尽管这样的请求在她看来非常有损脸面，然而她迫不得已。她不愿意为了赚钱而做那些与绘画无关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当她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绘画形式从而可以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时，时间对她尤其珍贵。此外，莫德尔松也一直在为保拉的艺术出力，即便遭遇婚姻危机，他的支持也从未缺席过。所以，保拉的出名以及外界对她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的丈夫。

1906 年秋天，奥托·莫德尔松按原定计划来到巴黎，和保拉一起在那儿度过了冬天。他们握手言和了。在给克拉拉·里尔克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将带着些变化回到我原有的生活中来。我自己也变了样，独立了些，不再依赖过多的幻想。这个冬季让我认识到，我并非独自一人。除了那没完没了的经济上的担忧，另一个使我抛开自我的因素就是自由。我真的很想创作一些能证明我自己的东西。只有未来才能澄明我的行为是否鲁莽。而关键是：工作需要一颗平静安定的心，长久以来在这一方面给予我帮助最大的是奥托·莫德尔松。”

1907 年春天，有孕在身的保拉和她的丈夫回到了沃普斯韦德。在家里，她创作了大量富有巴黎风情的画。这年秋天，她在沃普斯韦德的家中生下一个女儿。在保拉怀孕及生产期间，她的母亲照料了他们一家的生活。母亲写信给保拉的姐姐赫尔玛：“保拉过得非常快乐，莫德尔松打算从德赖家租地或购地扩建花园，因为保拉打算今后多在花园作画（感谢老天！）”一切终于

复归正常，从现在起应该开始真正的生活和艺术事业了。“我无所畏惧，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此前不久，保拉在一封信中写道：“死亡才是我惟一惧怕的幽灵，才是惟一真实的不幸。”

1907年11月20日，保拉产后第一次起床。克拉拉·里尔克根据奥托·莫德尔松的口述，这样描述她起床后的情形：“她让人搬了一面大镜子放在床脚，然后坐在镜子前面梳理她那美丽的长发。她将头发编成几个小辫，最后在头顶做了一个王冠。她插上探访者带来的玫瑰，在打算上前搀扶的丈夫和兄弟面前轻松地踱到另一个房间。那儿一片灯火辉煌，房顶中央的枝形吊灯上，一个巴洛克天使身缠彩灯，展翅欲飞。这时，她请求家人把孩子抱来。当那个小生命静静地躺在她的怀中时，她说：‘这一刻简直就像圣诞节一样美妙。’突然，她双腿平伸着倒在了地上。当大家赶来抢救时，她只说了一句‘可惜’。”保拉·莫德尔松-贝克尔就这样死于血管栓塞，享年三十一岁。



**弗兰茨·格里尔帕策**

**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

“没有勇气展现自我，  
是我的一个主要缺点。”

## 缺乏找回自我的勇气

——格里尔帕策

弗兰茨·格里尔帕策：奥地利著名剧作家，在整个德语文学中，他是魏玛古典文学以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命运悲剧《太祖母》、爱情悲剧《萨福》等。

出生于1791年1月15日的奥地利作家弗兰茨·格里尔帕策在他三十九岁那年曾拜访过他的一位做了父亲的朋友，拜访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他那四个漂亮、健康、可爱的小家伙让我心动不已。本来我也是可以拥有这一切的。年逾三十而没结婚的人，充其量只能是个令人厌恶的强盗和骗子。”他订婚多年却迟迟不娶妻的原因则是：“对于孤独的需求在我的生活中是高于其他的一切。如果让我一整天总和别人在一起而没有任何独处机会的话，我会疯掉。此外，说话于我而言也是一件累人的事，让我感觉



异常；它是一种激情迸发，所以时不时地需要有所休养调整……”

生性沉默寡言、性格像含羞草般极度敏感的格里尔帕策而立之年的生活是相当好的，有充分的经济保障。大学毕业后，学法律的他成了奥地利财政机构的一名文职官员。由于工作十分清闲，格里尔帕策得以拥有大量的业余时间从事他的戏剧、小说和诗歌创作。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三十多岁的格里尔帕策在内心从没有过自信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能力抱有极大的怀疑，他经常有精疲力竭的感觉。三十五岁时，他曾这样写道：“近几个月来，我的状态真的很糟糕。我从来不曾有过才思枯竭的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过，我的精神创作已无路可走。一天中余下的时光都是在我精神恍惚、思想混乱的状态下消磨掉的。但是万能的上帝啊，这是什么样的上午，什么样的清晨啊！在过去的那些冬日里，尽管还没有具体成形的思想，但我一直有意识地想要创作些东西；可是现在，就连这样的希望也都失去了。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会让我产生一种无法克制的厌恶感，就连阅读也令我兴味索然。我讨厌戏剧，假如有人谈到我写的东西或建议我再写些什么，我的心中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可怕的感觉，就好像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一个又黑又空的、让我毛骨悚然的深渊；而且，那种自杀的想法也时常在我脑际徘徊。”

不久，他又写道：“没有勇气展现自我，是我的一个主要缺点。迎合他人口味以及在外表上不与他人有太大差距的努力最终使我变得与常人无异，而且习惯成自然。这一切与我所受的早期教育不无关系。我父亲是一个容不下任何偏爱和反感的人，就连身体不适也得不到他的怜悯，饭桌上不允许有一筷未动的菜存在。因此，我所过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小市民生活，办公室得经常报到，看似枯燥无味的生意业务尽管确实枯燥无味，但必须及时处理……”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直到现在我才可以说，我活着，因为只有现在的生活才是令我快乐的生活。”

# 令我快乐的生活

——席勒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德国著名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斯坦》、诗作《欢乐颂》及史学著作《三十年战争史》等。

令三十岁的人突显于众的不是他们曾经有过的狂喜，也不是那种充满了力量和勇气的前进精神——在此，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个少有的特例——而是一种对其自身不完善的意识、不满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挫败感，是一种由于感到做的不够或害怕一事无成而日见其长的失落。就像前几个世纪中的三十岁的人一样，今天正处于这个年龄的人们也害怕最后落到人微言轻的地步。此外，无助、因未来无从把握而产生的一种模糊的恐惧，以及偶尔出现的灰心丧气和停滞不前的感觉，也会让人产生

放弃或逃避的想法。

无论那些名人、伟人们的而立之年的经历有多么不同，然而似乎并没有人觉得那几年是特别令人快乐的几年。至少那些男性是这么认为的。这一点毫不奇怪。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而立之年所作出的决定都是影响深远的决定，是关乎到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家庭和居住地的有分量的决定。三十岁的席勒对于接受耶拿大学历史教授职位这一决定是否正确毫无把握，他在信中这样对未婚妻说道：

“是哪个邪恶的天才让我决定把自己束缚在耶拿这块土地上的？从中我一无所获，却为此而失去了很多。假如我不在此地，我就可以在我喜欢的地方生活，就可以计划创办一家企业，因为时间都是我自己的；而这一切都将远远好过现在。”

此前不久，也就是1789年11月10日，席勒刚和他的未婚妻夏洛特·冯·伦格费尔德及其姐姐夏洛琳娜在姐妹俩的居住地鲁道尔城庆祝了他的三十岁生日。姐妹两个他都喜欢，但他最

终还是选择了夏洛特。一年前，他在鲁道尔城第一次遇见歌德。关于见面的情况，他在随后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见他的第一面几乎毁掉了他原先在我脑海中那享有极高评价的、富有魅力的美好形象。他中等身材，穿着呆板，行动僵硬。他面无表情，双眸却生动而极富感染力，目光令人产生依恋之感。他的神情十分严肃，然而严肃中又透着友好和善意。他的头发为深褐色，看上去比我所估计的实际年龄要老些。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叙述流利、生动而风趣，旁人都十分乐意听他说话。要是遇上他心境好的时候，他就会饶有兴致地滔滔不绝。我们很快就相识了，而且谁都没有丝毫的不情愿。只是周围人太多，又都争着与他交谈，所以我没有找到与他独处的机会，也没法与他谈论一些特别的问题。他喜欢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地在谈话中提到意大利。总而言之，我的宏伟理想并没有因为与他相识而受到不利影响。我只是怀疑，我们是否会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在他身边度过的那段时光中有很多



令我至今还难以忘怀的有趣经历，有一些是我至今还在向往的东西。他比我年长一些，然而在人生阅历及自我发展方面却远在我之上，是我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他的气质从一开始就与我的不同，他的世界不同于我的，我们的想像方式似乎也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这次短暂的会面还不能说明我们是否能够合作、是否能够成为朋友。时间会对此作出结论。”这就是年近二十九岁的席勒有关他第一次与比他年长了10岁、于3个月前刚从他历时两年之久的意大利之行回到德国的歌德会面的描述。

歌德后来有一次提到，青年席勒曾是一个令他感到厌恶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友谊，或者说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歌德通过将二十九岁的席勒介绍给身为耶拿王侯总协会成员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从而为后者谋到了耶拿的教授职位。在给大学的一封推荐信中，歌德这样写道：“一段时间以来，弗里德里希·席勒先生或在此地或在附近居住，通过自己的多部著作



已赢得了一定的名声。尤其是最近的一部《尼德兰独立史》，足以让人相信他是历史专业的行家……认识他的人都对他的性格及生活方式作出过正面肯定的评价。他态度认真，举止可人。可以相信，他会对年轻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席勒在他三十岁那年收到并接受了耶拿的聘任。一开始，他很高兴自己不再是“文学世界中居无定所的人”了，但是紧接着他便感觉受到了“欺骗”。因为这个教授职位不仅不提供薪水，而且还让席勒为此承担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开支费用。席勒生气地向他的朋友克尔纳抱怨道：

“我讨厌这个教授职位，它掏走了我口袋中一个又一个的金路易。哥达和科特堡的枢密办公厅已经寄来了两个用于考察旅行费用的帐户，每个邮件日还会有其他两份来自于迈宁根和希德布尔豪森的帐目。我几乎得为每一个帐目支付5个塔勒，哥达的那个则需要6个。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得花去6个塔勒。就这样，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支付了60塔勒，却没有拿到任何有关凭证。花钱的事情来得比人想得

还快，常常令我的钱包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然而，有关这个教授职位并不提供薪水一事，席勒事先是知道的。而他之所以为了这几项名目各异的费用而大动肝火，事实上是有着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的。席勒的传记作家弗里德里希·布尔舍尔认为，席勒不无理由地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大学教师这一职务。“这里的先生们都不知道，我并不具备博学多才这个条件”。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某些学生知道的历史知识可能比我这位教授先生还多”。

他担心这项教师职务会过多地占用他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间和精力。“我要么做一个完整而彻底的艺术家的，要么就不做”。他在信中对朋友克尔纳这样说道，“一切取决于我是否能在两年之内争取到一份得以维持生计、清还债务的薪水……”那些债务——他继续写道——“令我的生活毫无滋味，而这样的心态必然会牵连到我的写作事业。我渴望宁静，向往自由，只有现在这一步才能助我实现愿望”。他把“这一步”，也就是接受教授职位这一决定称之为“一

种英雄般的妥协”、“为我的生命赢得一条光明前途而对今后三年的快乐所作出的放弃”。令三十岁的席勒感到安慰的是：之前他曾经被迫学医，那时他不得以中断了在“诗的世界里畅游”，而那次中断带来的结果是更加勤奋，之后“不久”他便写成了《强盗》剧本。

席勒并没有像他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无法胜任耶拿教授一职；相反，上任后的一切都开展得十分顺利。他就职后题为《什么叫作世界史以及人们研究它的目的》的首次讲座引起了轰动。他这样向克尔纳描述当时的情况：“我的讲座令人印象深刻，城里的人整晚都在谈论它。我受到了学生们的关注，而对于一个新教授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人们为我奏响了一首夜曲，还为我高声欢呼了三次。”

他的第一次讲座引来了 400 名听众，然而他们并没有一如既往地忠实于他。当席勒于 1789 年至 1790 年的冬季学期开始举办他的收费私人讲座（相对于他在夏季学期所作的免费讲座）时，一共只来了 32 名听众，而且在这 32

人当中只有 10 人是准备或者有能力交付听课费用的。再往后,他的学生减到了 20 名。就这样,他那个用授课所得报酬来摆脱经济困境的愿望,最终没有得以实现。

出生于 1759 年 11 月 10 日的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岁时,还绝不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但是这时,他想到了结婚。为促成他的结婚愿望,同时也为了将他留在耶拿大学,魏玛公爵授给了他内廷参事的头衔,并向他提供了——那是在他三十岁生日过后的第八周——一份总额为 200 塔勒的年金。与歌德这一时期 3000 塔勒的最低年俸相比,席勒的这份年金并不算多。只是因为未婚妻的母亲表示愿意每年资助 150 塔勒,席勒和他的夏洛特最终才敢于跨入婚姻的殿堂:1790 年 2 月 22 日,他们结婚了。在耶拿的乡村教堂举行过婚礼后,他们和少数几个朋友简单地庆祝了一下。除了席勒原有的单身公寓外,他们又租了一个带有贮藏室的房间。婚礼后的第八天,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克尔纳:

“我现在的的生活是多么美妙啊!我神清气爽

地环顾四周，我的心灵在它之外得到了一种持久而温柔的满足，我的思想得到了丰富的养料和充足的休养。我的存在达到了一种和谐的一致。我们并不是极其紧张地、而是安静愉快地度过了这些天。我还是像从前那样静候着我的工作，同时对自己还多了几分满意。”三个月后，他写信给他的姐姐：“我们过着一种非常幸福的生活，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直到现在我可以说，我活着，因为只有现在的生活才是令我快乐的生活。”

从其他的信也可以看出，和他那年轻妻子的共同生活的确让而立之年的席勒感到很幸福。美中不足的只是他们那不太令人满意的经济状况。为了每天的面包，特别是在以前的债务尚未还清的情况下，他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勤奋地写作。在撰写《三十年战争史》那会儿，他每天在书桌旁一坐就是14个小时。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他觉得应该为自己的健康感到庆幸，因为“尽管工作如此繁重，但他那健康的身体从未发生过意外”。

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工作的繁重有时会让席勒产生一种精疲力竭、极度疲惫的感觉。他的妻子为此十分担忧,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丈夫的出版人格兴。席勒——弗里德里希·布尔舍尔认为——“从童年起就没有真正健康过”。在曼海姆时,他甚至还得过一场疟疾。1791年初,也就是《三十年战争史》即将完成之际,席勒病了。这一场病来势凶猛,曾一度危及到他的生命。他连续发了一个星期的高烧,不断地呕吐出带脓的鲜血。这场被他称为“卡他烧”的病可能是一次带有胸膜化脓的肺炎。在他刚刚有所恢复时,第二次更为严重的发作又紧随其来。这一次的病因大概是极易引起败血症从而导致死亡的横膈膜脓破裂。席勒最终战胜了病魔,但却没有彻底康复。打那以后,胸闷、胸痛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的疼痛一直折磨着他。或许大病之后的他留下了慢性腹膜炎这个后遗症。

直到几个月后,席勒的身体才慢慢恢复,但他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我不知道,最终会怎样”。他这样写道,“只是我现在少了几分

担忧……总而言之，我的内心应该感谢这一场可怕的大病。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死神的到来，而我的勇气也随之增加了”。

与席勒因患病而遭受的精力、时间及金钱的损失相比，特别是与他因患病而不再健康的身体相比，那种阅历的增长对他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场病的确出人意料地给他带来了一些好的结果：由于在丹麦被谣传死亡，他收到了来自丹麦的哀悼和慰问；而当那里的人得知他还活着、只是无法正常工作时，他们便给他提供了一份退休金。石荷宗德堡的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储君向这位他所敬慕的作家赠送了一份 1000 塔勒的年金，为期三年。

席勒还在病中时就开始了对伊曼努尔·康德作品进行研究。接着，他写下了《论秀美与庄严》、《论崇高》、《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和《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几部美学著作。他出版了一个诗歌年刊，和歌德一起创作了一些讽刺短诗，还写了很多叙事诗。三十九岁那年，席勒终于完成了那部历经多次修改的伟大戏剧《华伦斯坦》。



卡尔·楚格迈尔

Arl Zuckmayer

1896—1977

“有超过 100 家的剧院  
在看了当晚的报道后打电话  
要求购买这个剧本。”



# 一举成名

## ——楚格迈尔

卡尔·楚格迈尔：德国剧作家。

他的作品批判地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的许多现代问题。主要作品有《欢乐的葡萄园》等。

和席勒一样，对于 150 年后年轻的卡尔·楚格迈尔而言，要靠自己的戏剧赚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896 年 12 月 27 日出生在莱茵河畔纳肯海姆的楚格迈尔，在参加完中学毕业考试后立即应征入伍，作为战争志愿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队里，他成了少尉。战后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海德堡尝试着学了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植物学和生物学后，他来到柏林，准备在那儿进行他的戏剧创作。二十三岁的楚格迈尔有幸将他的戏剧《十字路口》搬上了城市剧院的舞台，但是这次演出彻底失败了。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写文章批评道：“这名

偶尔写成过几行优美诗句的抒情诗人，将永远创作不出一个适合于舞台演出的句子来。”上演了三次后，这部戏剧就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多年后，楚格迈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然而，我的胃口没有因为这个沉重的打击而变坏，我的自信没有因此而丧失，我没有想到过放弃。正是这样的失败——那时的人们是这样认为的——才是一种骑士晋封仪式。假如成功来得既快又顺，那么这种成功就值得怀疑。相比而言，这次失败则更为光荣。一个年轻的戏剧家必须得受人争议，否则他就毫无价值。起码我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在戏剧创作中，我有一种得心应手、如鱼得水的感觉。”

说是这么说，然而对于那时的楚格迈尔来说，他更希望的则是能够顺利地获得一次成功。当六十岁的他回忆起当年在柏林奋斗的日子时，仍然认为那是颇有收获的几年：“我留在了柏林，没钱，没地位，没有名声，柏林开始将我一点一点地吞噬……我从柏林的下层开始去了解这个城市，我住过地下室，租过简陋难看的出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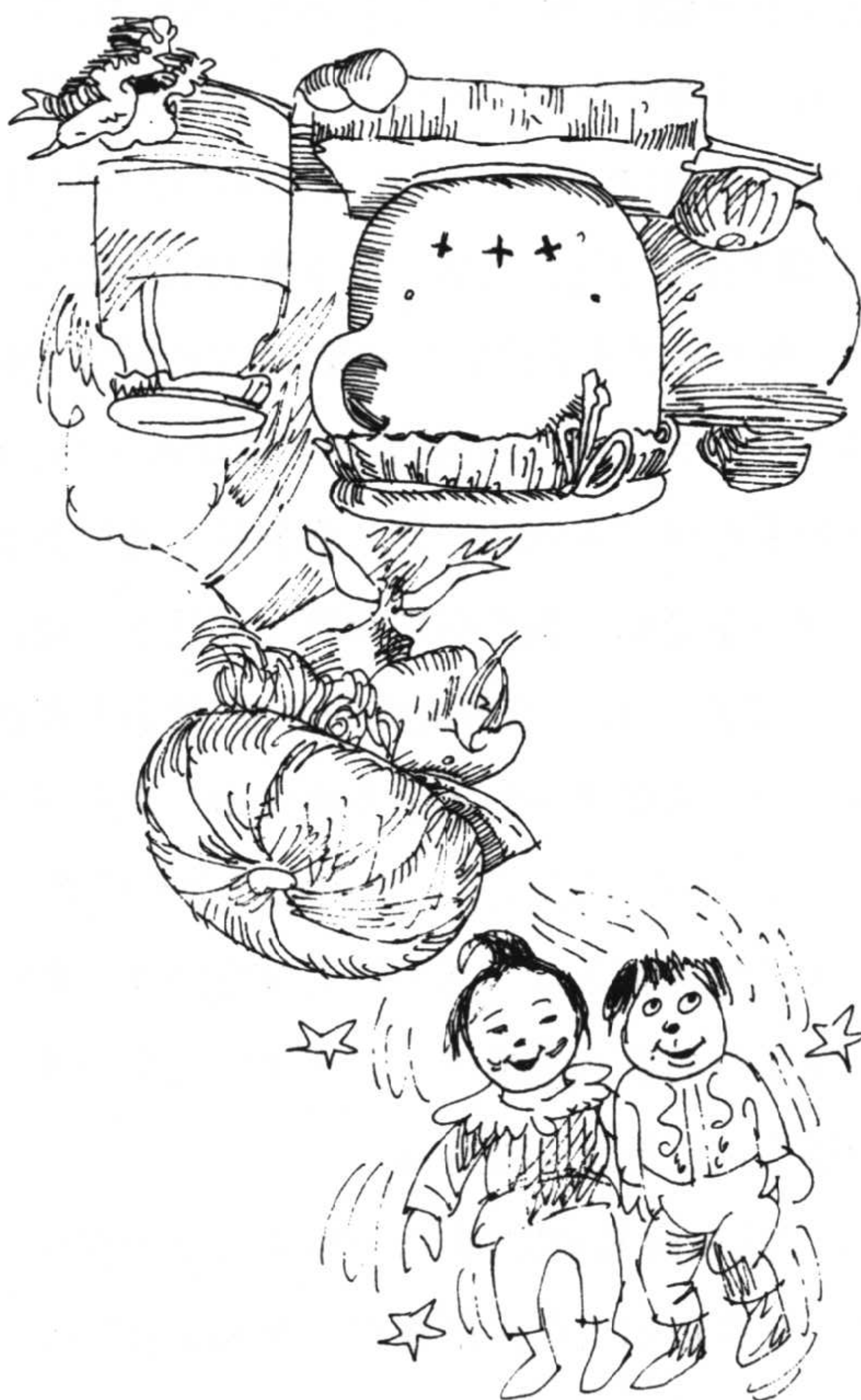
房和阴森昏暗的后院。出门在外做学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不想再进大学学习,那只是浪费时间。我根本不想做任何我父亲要我干的或者被认为是理智的事,所以我也不能再靠他养活。”

大约两年后,楚格迈尔成了基尔城市剧院的戏剧顾问。由于牵涉到一桩当时轰动一时的剧院丑闻,不久他便离开了基尔,重新回到柏林,和布莱希特一起成了德意志大剧院的戏剧顾问。其间适逢他的《潘克拉茨醒了还是那些乡巴佬》上演;然而不幸的是,他又一次惨遭失败。三十岁那年他和女演员阿莉赛·赫尔丹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写下了那部具有民间戏剧风格的喜剧《欢乐的葡萄园》。接下来发生在楚格迈尔身上的事就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成功”来形容了。一切如童话一般,穷人一夜间就变成了富翁。

《欢乐的葡萄园》的首场演出时间是在1925年的圣诞节前两天,地点在造船厂工人堤旁的剧院。“我妻子穿了一件从她的一个朋友那儿借来的华丽的晚礼服和一双银色的鞋子,我

把我的一件黑色的旧西装擦得亮晶晶的，还赊了一双漆皮皮鞋……”楚格迈尔的回忆录《我的戏剧人生》就是从描述那个瞬间改变了他人生的夜晚开始的。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夜晚，发生在他三十岁生日的前五天。“我无法描述，那个夜晚是怎样度过的。”他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在我的记忆里，它犹如一场举世无双的飓风咆哮。我没有观看演员们的表演，而是聆听着他们的声音。我发现，他们的表演热情越来越高，演出效果好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排练。通过消防道的一条缝隙，我看到观众席上起伏着一道由人头、人脸和衬衫前胸组成的浪潮；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从那张开的嘴中不断发出一声声的尖叫。人群中似乎爆发了一次相互感染的狂笑病，一次流行性癡狂症，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种中世纪才有的群众激情里。而当时的观众以及之后的评论也是这样描述的。”

《欢乐的葡萄园》在这个柏林之夜取得成功  
后，楚格迈尔的名声渐渐在柏林和柏林以外的  
地区传播开来。第二天上午，楚格迈尔说道，“有



超过 100 家的剧院在看了当晚的报道后打来电话要求购买这个剧本”。这意味着收入大增。六十岁的楚格迈尔还相当清晰地记得在那个 12 月 23 日所发生的事：“那天，乌尔施泰因出版社那个两天前曾拒绝过以 100 马克买我剧本的经理对我说，他可以答应我提出的任何一个数目，最高限为 1 万马克，因为圣诞节前他已经没有更多的现金可以支付给我了；但是圣诞节后，我自然可以拿到更多的钱……还是沉浸在先前那种轻度眩晕的状态下，我把一捆纸币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这个在上演前就已经为楚格迈尔赢得了克萊斯特奖的戏剧，在柏林和其他地区的舞台上持续上演了两年半。在这种情况下，卡尔·楚格迈尔起码在经济方面可以过上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而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对于不久前还十分寒酸的他来说，金钱的作用在刹那间完全变了。现在的他所拥有的财富即使不是用之不尽，也是远远超过了他所需要的。但是与伏尔泰不同，他根本就没想到要用这笔财产进行投资；他

只是单纯地生活,单纯地花钱。一天晚上,他决定买下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水磨坊。事情是这样的:楚格迈尔和他的妻子曾于《欢乐的葡萄园》上演期间在希登湖度假。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奥地利作家理查德·比林格跟他谈起了“那个孤零零地搁在萨尔茨堡亨多夫附近的水磨坊”。水磨闲置着,正被“它的主人、即奥地利最古老的旅馆之一、著名的亨多夫‘卡斯帕-摩泽酿酒厂’的老板兼继承人”估价待售。在那个寒风呼啸的冬夜,他们已经喝了“无数格罗格酒”。比林格把“那个水磨坊及其周围的环境描述成了一个充满诗意的、被施了魔法的童话世界,让人根本无法想像它的本来面貌,更谈不上找到它了,而且所有有关磨坊长度、高度、特性的精确数据都是错误的”,楚格迈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然而,他的话却让我们异常激动起来,而且他说得越多,那份产业就越吸引人。我妻子是奥地利人,而我本人则为此而离开了海边,来到这个有山有林的农民国度……”“又喝了几杯格罗格酒”后,楚格迈尔“决心已定”：“午夜时分,我们

给那位未曾谋面的旅馆主人卡尔·马耶发了一封内容为‘欲购磨坊,速寄合同’的电报。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他的回复,电报内容是:‘最好先看一下,卡尔·马耶。’”

之后,他们真的去萨尔茨堡的亨多夫观看了那个水磨坊。主人认为应该在晚上带他们去那里:“我们提着几盏燃着的灯朝山下走去,草地上一片寂静,溪水潺潺唱着歌,院中的井水叮咚作响。昏暗的云杉墙后有一幢 20 年来无人居住的房子。楼上的房间里还摆设着华丽而花哨的农人床柜,是前几任磨坊主的财产;楼下的客厅空旷而冷清,杂草从大门一直长到门厅。屋子里没有灯,我们把带来的灯放在壁炉台上,然后坐在了内嵌式的长凳上。我们随身带了葡萄酒,每人饮了一口之后,就越发觉得这闪动着暗色烛光的空间像自己的家了。过了一会儿,屋子在我们的想像力作用下经过桌子、椅子、家具和其他一些器具的一番装饰顿时变得生动起来。‘餐具柜得摆到这儿来!这里放餐桌!那儿放一个老式的落地大摆钟应该会很漂亮,可以找一个这



么大的、带有绘制钟面的……再找一个可以摆放罐子和很多锡盘的壁架，天花板上的灯可以用一个轮状的铁箍或一个木制的、画有花纹的马颈圈来代替……，椅子得找这样的，窗帘做成这种式样，买这样的桌布，配这样的餐具……。”

事实证明那个夜晚的设想并不只是一个梦想；他们的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几个星期后，我们在那个夜晚于尘土和蛛网之中的设想最终都变成了现实。”楚格迈尔以后几部剧本——《辛德汉尼斯》、《卡塔琳娜·克尼》、《克佩尼克的上尉》和电影《蓝天使》的剧本等等——就诞生在那个亨多夫的旧磨坊中，他说：“我向来只能在农村进行我的创作。”

1933年，当纳粹分子在德国上台后，楚格迈尔举家迁往亨多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把在亨多夫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了“活在天堂的一瞬间”。这段天堂般的幸福生活于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就走到了尽头。对于这个时候已经四十岁的楚格迈尔——他的长篇小说《萨尔瓦还是博岑的玛格达莱娜》于1935年被纳粹

分子查禁并销毁——来说，对于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将从此走上被迫流亡的道路。他们身无分文，带着两个随身小包裹来到瑞士，一年后又去了美国。在美国的一个农场上，楚格迈尔和妻子两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

“……每当我下定决心  
有所举措时，我就会失去我  
最重要的生存根基。”

# “我的心伤得如此之深……”

——克莱斯特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德国

18、19 世纪著名剧作家、小说家。

主要作品有喜剧《破瓮记》、《赫尔

曼战役》、《洪堡王子》、小说《智利

地震》等。

出生于 1777 年 10 月 18 日的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在他的而立之年怀着一种对自身前途及生活意义的怀疑、在穷困潦倒之际走上了自绝的道路。尽管在二十五六岁时就已经有过多次轻生的念头，但他还是努力工作了十几年，不仅创作了大量悲剧和中篇小说，还一手创办了《柏林晚报》。只是这一切并没有让他得到外界的认可，也没有使他成功地摆脱经济困境。

克莱斯特曾经想把他的《海尔布隆的小凯蒂》一书卖给出版商科塔，酬金“无论多少都可以”，只要后者尽快支付。但是科塔拒绝了。当一

位叫赖默尔的柏林出版商表示愿意投资出版该书时，三十二岁的克莱斯特给他写信道：“时世艰难，我知道，您无力支付太多。您看着办吧，给多少我都没意见，只要您尽快支付。”

克莱斯特的《柏林晚报》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晚报》于1811年春天停刊。“真的很奇怪，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成功的，每当我下定决心有所举措时，我就会失去我最重要的生存根基”。尽管时日艰难，克莱斯特还是在困境中完成了他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戏剧《洪堡王子弗里德里希》。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克莱斯特认识了亨利埃特·福格尔。后者是一名宫廷会计师的妻子，患了癌症，但是不想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于是，她和克莱斯特相约一起离开这个人世。1811年11月19日，克莱斯特在给他表姐玛丽·冯·克莱斯特——一个年长他16岁的知己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最亲爱的玛丽，当我的心灵在这死亡来临的时刻唱起胜利之歌时，我不禁又想起了你，

我不得不尽我所能向你坦白我心底的一切：你是惟一能读懂我的那些想法和感受的人。我在内心克服战胜了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大小，零零碎碎，……”接着，他又不指名地谈到亨利埃特·福格尔，“你只需知道，我的心灵通过与她的心灵相接触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坦然面对死亡了，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人类情感的一切美妙之处。我选择死亡，是因为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值得我学习和追求的东西了。再见！你是惟一一个让我想在彼岸再次见到的人……”

1811年11月20日，克莱斯特和亨利埃特·福格尔一起来到柏林附近万泽湖边的一个小旅馆。他们在那儿吃了点东西，神情——事后有人这样作证道——“非常快活”。喝过咖啡后，两人各自回房写信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找了一名信使，把寄往柏林的信交给了他。接着，他们又吃了一点东西，跟旅店老板结了帐。下午时分，他们在旅店门前徘徊了一阵，还不时地跟店主交谈几句，之后便进了厨房。在厨房里——店主这样回忆道——

“那位夫人问我妻子，他们是否可以让人把咖啡送到湖对岸那个美丽的草地上去，她认为那边的风景很漂亮。我妻子对此表示很惊讶，因为那儿离我家实在很远。但是那位先生显得十分友好，他说他会支付仆从的辛苦钱，同时还要了80芬尼的朗姆酒。接着，这两人就开始朝那个地方走去……那位夫人在胳膊上挽了一个小篮子，篮子上盖了一块白色的手帕，篮子里大概就放着手枪……尽管我妻子惊讶于这两位客人要在这么寒冷的冬日在户外喝咖啡，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妥。我们让临时工里比施的妻子跟着他们，之后便从湖的这边看到他们在对岸蹦蹦跳跳往湖里扔石子玩……”

里比施作为目击者的证词是这样的：“不久，我妻子喊我帮她把那两位异乡人要的桌子椅子搬到对岸去。于是，我和我妻子分别扛着桌子和椅子爬上了万泽湖边的小山包。那两名异乡人就站在那个地方。咖啡已经被他们喝得只剩下最后一杯；在我们到达山顶时，那名男子正往最后一杯咖啡里斟入瓶子里剩下的朗姆酒。

他当着我的面将咖啡饮完后，对我说道：“请告诉你们老板，让他再给我们送些朗姆酒来。”那位女士却说：“可爱的孩子，你还要朗姆酒吗？你今天喝得已经够多的了。”那位先生回答道：“好了，亲爱的孩子，要是你不情愿的话，我也不强求。就这样吧，上帝，我们不需要什么了。”……接着，他们要我妻子去取一支铅笔来。之后，我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时，我们看到这两个异乡人手牵着手朝山下的湖边蹦蹦跳跳走去；他们互相追逐着，一路有说有笑，就像在玩小孩的捉人游戏一样。我很少见到过像山上这两个彼此间那么友好的人。他们一直称对方为孩子、亲爱的孩子，而且还非常快活……”

临时工的妻子真的给他们送去了一支铅笔。在她刚走上回家路不久，就听到连续的两声枪响。当人们最后找到克莱斯特和亨利埃特·福格尔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克莱斯特先朝亨利埃特·福格尔的心窝打了一枪，接着便饮弹自尽——子弹从他的嘴巴一直穿入了大脑。这一年，克莱斯特三十四岁，亨利埃特·福格尔大约三十一岁左右。





皮克勒－穆斯考

Puckler-Muskau

1785—1871

“狡兔三窟，而我却有  
四窟。”

## 成功的幸福追求者

### ——皮克勒-穆斯考

皮克勒-穆斯考：德国文学家和世界公园穆斯考公园、布拉尼茨公园的建造者。前者属意大利建筑风格，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克莱斯特是否真的已经没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可能，这一点无人知晓。他的朋友、作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认为，克莱斯特的死亡与其自身不无关系，他之所以选择轻生是因为他感到壮志未酬、生不逢时，对自身能力失去了信心。克莱斯特本人曾在一封写给他同父异母姐姐乌尔丽克的绝笔信中——写于万泽湖边那个旅社，“我离开人世的这一天早晨”——这样说道：“事实是，在这个世上我已是一个无药可救之人。”

情况或许真的如他所言；然而不管怎样，这肯定是他的真实感受。“当这个可怜的人连他最

为珍爱的天赋都舍得割舍时”，拉埃尔·瓦恩哈根的丈夫瓦恩哈根·冯·恩泽这样评价道，“可以想见，他肯定已经在最糟糕的边缘痛苦地徘徊很久了。”接着，瓦恩哈根又补充道：“我对以此为终点目标的道路并不陌生。”

尽管这一番言语道出了某些人的心声，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这样一部分人——所幸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的脑海中从未出现过这些想法；相反，他们会在任何情况下找到一条出路，或者至少会去寻找这条出路。1785年10月30日出生在尼斯河畔的赫尔曼·冯·皮克勒-穆斯考侯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数不清的奢侈爱好：宝马香车、旅行、女人、山珍海味、时尚华服、日夜豪赌（他偶尔会小赢一把，但更多的时间是输，而且每回输掉的都是巨款）。这些爱好不仅花去了他父亲的一大笔财富，还使得他自己负债累累；而这些债务最终又全部落到了他父亲的头上。

在意大利和法国旅行了几年后，三十岁的



皮克勒-穆斯考最终决定把家安在家乡穆斯考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将从此告别那些奢侈的爱好;恰恰相反,现在的他又多了一项新的、花费同样巨大的爱好——园艺。他兴致勃勃、激情满怀,但却把这种激情简单地称为对园艺的喜爱;而他所谓的“园艺”就是改建穆斯考宫殿、将穆斯考周围一带改建成风景宜人的公园。为了筹措到足够的经费,三十岁的他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谨慎态度寻求起一门合适的亲事来。

最终,他在年长他九岁的拉彭海姆伯爵夫人卢齐厄身上看到了希望。卢齐厄是普鲁士首相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亲王的女儿,亲王从1810年起开始主持全普鲁士的政治事务,在朝在野都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二十岁那年,卢齐厄·哈登贝格嫁给内廷大臣卡尔·特奥尔多·弗里德里希伯爵为妻。尽管婚后有了三个孩子,但是这场婚姻并不幸福。六年后,卢齐厄离开了她的丈夫。当皮克勒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和女儿阿德尔海德及教女黑尔米娜住在柏

林。三十九岁的卢齐厄被描述得非常漂亮,而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位深通世故、善于交际的贵妇。

亲戚朋友都称卢齐厄为拉彭海姆的“盘羊”;没过多久,皮克勒也开始使用起这个称呼。在此期间,他不仅对她大献殷勤,同时还向她的两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她的亲生女阿德尔海德和她的教女黑尔米娜——发起了进攻,并且对于后者的攻势更为猛烈些。他倾心于美丽非凡的黑尔米娜,甚至还爱上了她,而这一切他都没有对他的未婚妻“盘羊”有任何隐瞒:“多可惜啊,”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不是生活在土耳其;要不然,我就可以同时娶你们两人为妻。这样一来,我至少不会由于抉择不定而不知所措了。”

皮克勒最后将绣球抛向了他的“盘羊”,这一结果自然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她不仅自己有钱,而且还可以从她的父亲那儿继承到一笔更大的财富。早在与皮克勒结婚(“盘羊”为此不得不和她的拉彭海姆伯爵离了婚)之前,她就已

经开始资助皮克勒建造房屋和修建公园了。他不断地在信中请求她的经济援助。在英国买的8只狐狸和4匹马花去了6000帝国塔勒,3000塔勒用于买车,还有1000塔勒是用来购买小件什物的。“最好是,”他在求助信中写道,“马上汇1万塔勒过来。”

一次,他收到“盘羊”寄给他的200弗里德里希金币后,在信中这样写道:“很抱歉,我的好盘羊,你寄给我的这笔钱于我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想一下,假如把泥瓦工、木匠、临时工计算在内的话,宫殿、公园、狩猎屋、动物园和养狗园等各处工程我至少得雇200个人。平均下来,每天花在工程上的费用就是100塔勒,这还没有把木材、石头、石灰、铁等等材料计算在内。要是我们已经结婚,这一切自然可以得到紧缩。但是在这之前,我还是希望把所有的地方都修缮一番。从事过建筑的人都知道,区区几千塔勒连修个门槛都不够……”接着,他又列举了几项类似的费用。但是他认为,他所花去的并不是大笔的钱,而是一笔笔小款项:“就像在过去的两个月

中用掉的 3.6 万塔勒一样,刚才我跟你提到的都是一些额外的小费用。”

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的小盘羊,要是我告诉你我还需要 2000 塔勒,你肯定会生我的气,视我为世上少有的混蛋。因为除了接下来的一些工作,绝对有必要赶在庄稼收割之前把狩猎屋所在的动物园用篱笆围起来……有了篱笆后,就可以把猎物放进动物园。到九月份时,你就可以看到有 500 头各种各样的猎物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地到处徜徉了。但是,修建这一圈篱笆需要 3000 塔勒……五年后待一切竣工时,穆斯科的公园就是全德国独一无二的公园了。”

由于他的妻子在花钱方面并不见得比他节约多少,所以一点儿都不奇怪,她也有弹尽粮绝的一天。有一段时间,她一直靠卖首饰、钻石和珠宝生活,同时还指望着有一天能从老父亲那边继承一大笔遗产。然而,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伯爵于 1822 年在盖努阿的一次旅行途中的暴卒让他们遭受了无比巨大的失望;和比他小了 35 岁的女婿一样,七十岁的哈登贝格



也已经负债累累，债台高筑了。皮克勒虽然在哈登贝格的帮助下刚刚得到侯爵封号，但是面对这场灭顶之灾他实在无计可施。有关哈登贝格亲王的遗产情况是这样的：欠国库 8 万塔勒，欠不同的债权人共 6000 塔勒（现在，这些债权人带着各自不同的算盘找到了“盘羊”和皮克勒侯爵），以哈登贝格地产作抵押的 40 万塔勒的债务。对此，皮克勒侯爵这样写道：“乌云遮蔽了我们的视线，对它的视而不见是无济于事的。”他没有轻言放弃。他在信中对他的“盘羊”说：“听我的话，我希望并且有信心过上即使不算殷实，但也是快乐的生活。”

只是事到如今，“盘羊”可再也不愿盲从于她亲爱的侯爵了。她想出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摆脱经济困境的惊人计划。她建议后者跟她正式离婚，在两人保持事实婚姻的前提下后者去英国娶上一位富有的继承人，以此来获取大笔财富。

皮克勒侯爵接受了她的建议。在解除了和“盘羊”的婚姻关系后，他真的去了英国。年近四

十的他在那儿待了有三年之久，走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城堡。为了结识不同的贵妇，他受到了上百次的接见。而有关这一切——他的穿着、发色、人们在报纸上对他的议论以及妇人们对他说的话——他都在信中向“盘羊”作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他过得并不快乐。

“该死的头发这一回没有做好，”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半红半黑，以至于我不得不再一次承受无法外出交游的痛苦——因为这的确是一种痛苦。”他不无轻率地在信中向“盘羊”描述他和几个在英国争来的情妇之间的一段五角恋爱：“狡兔三窟，而我却有四窟。第一个是美丽的医生的女儿，拥有 5 万里维的财产；第二个身价是 4 万里维的商人之女，非常漂亮，是一个善良而又无知的姑娘；第三位虽长相丑陋，但举止大方得体，拥有 10 万里维；第四位只有 2.5 万里维的财产，但却温柔美丽，聪明而有教养。一号女子因其父母的拖累是最糟糕的人选，而其余三位则都愿意独自陪伴在

我的左右。在不出现其他强劲对手的情况下，我想只要我诚心求婚，应该不会遭到她们任何一位的拒绝。”

然而，要想得到一次婚姻的承诺，恐怕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事实上，由于皮克勒侯爵不会跳舞，就连如何亲近年轻姑娘也成了他的一个难题。在参加了一次由诺特洪贝兰德公爵举办的舞会后，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要是我会跳舞，我肯定已经结过好几次婚了。——但是玩笑归玩笑，跳舞在这儿的的确是结识伦敦年轻女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甚至是惟一的途径。因为现如今流行的是，在一支舞曲之后领着自己的舞伴到处走走看看，惟有如此才能（但只是对于会跳舞的人而言）拥有最充分的理由与她们一起消失在周围的房间里。是的，我亲爱的盘羊，在你把你的孩子送到这异乡之前，你早该让他学会跳舞。像我这样一个架子十足、脸色苍白、表情严肃而又不会跳舞的高个子家伙，姑娘们是不会喜欢的……”

但是除此之外，这位不久便到处被人称为

“追逐运气之人”的德国侯爵身上还有一个不讨英国姑娘喜欢的地方，那就是——一天，一位同样不喜欢他的兰茨道尔小姐向他解释道——他曾离过婚。“我亲爱的侯爵，”她说，“在这儿您是找不到妻子的。根据我们的法律，对婚姻的不忠是离婚的惟一原因，人们根本不认可其他的可能性。假如一位英国姑娘嫁给一名再婚者，她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已婚男人的情妇。”

皮克勒侯爵确实没有在英国娶到他所要的女人。然而，他在此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旅行札记以及许多写给前妻的信件表明，这三年的幸运之逐并非一无所成。这个名为《生死遗言》的四卷本书信集在大获成功的同时，还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其间，这位还在不停旅行着、写作着、还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旅行作家的侯爵早已步入了不惑之年。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痴心不改地忠实着他的风景园艺（和他的“盘羊”）。他于1845年卖掉的穆斯考公园以及在布拉尼茨建造的第二个公园都获得了世界声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富有而受人尊敬的皮克

勒-穆斯考侯爵作为一名旅行者继续行走  
在世界各地，他一如既往地  
在旅行途中给他的“盘羊”写信，  
不断地追寻着美好的事物，  
同时还谱写了一段又一段感人的恋曲。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正文	